



{ 闽 都 文 化 掠 影 }

高士其故居

唐希文/图

高士其（1905-1988），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全身瘫痪的他毕生致力科普写作，以众多科普童话著作，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鳌峰坊东口的高士其故居，是他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高士其故居曾是明代学者郑善夫园林别墅，后为高士其祖上购得。作为京官的郑善夫不与明末宦官集团同流，正德年间因劝谏皇上勿行劳民伤财的南巡而受廷杖并罚跪五天，被打了“三十公板”却没致命伤残。他辞官返闽读书，在于山建少谷草堂和迟清亭，其意为：期待天下之清明也。这上下五进的古厝选址在于山东麓的水脉上，几乎每进一井。侧座三进园林式建筑九仙泉井久旱不涸，迟清亭前活水成池。池旁的二层砖木楼是民国风格洋房，是高士其少年时代课读的地方。

在风雨中幸存下来的古建筑，躲过推土机的蚕食，余下的三进老厝被辟为高士其故居。主座展示他的生平事迹和著作文本，还引进声光电设施的科普课堂，专程从北京接回他的家俬与生活用品，再现他在京城故居里晚年生活的场景。高士其故居再现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目 录

往事追忆

- 4 我的少年时光/何康口述 何达 何迪 整理
- 16 郭阶三家族的台海情/郭 震
- 19 我与福州一中的情缘/晏露芙
- 24 明月松间照 竹林风萧萧——我与福建农学院魁岐协和大学旧址
跨越70年的回忆/口述：汪霁晨 整理：林丽钦

文苑艺林

- 28 福州地区名人祠庙祭祀与福州人的精神/杨济亮
- 35 考辨福州方言之古汉语“化石”（一）/施文铃
- 38 《荔枝换绛桃》：福州特色的中国式悲剧/邹自振
- 43 张睦历史贡献管窥——闽侯张氏祠堂的碑记、匾额/唐浩茫
- 45 《林徽因与文化遗产保护》评介/陈常飞

十邑纵横

- 48 邻霄去天知不远/蔡 林
- 51 大山里“吃素的”古厝/林 山
- 54 浸透书香的传承/江 榕

人物春秋

- 56 何遂与何振岱/何华龙
- 59 福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刘永业与“电光刘”家族/石丽钦

封面：华林寺大殿（林振寿 摄）

彩插：潘墩明清古建筑群（林振寿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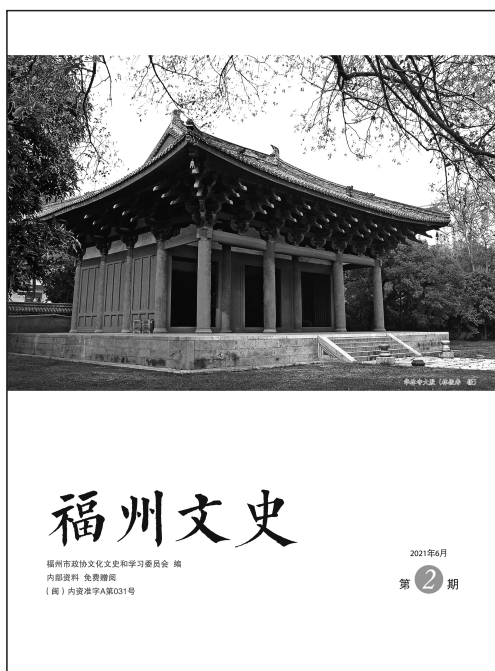
封底：张斌篆刻

FU
ZHOU
WEN
SHI

福州文史

2021年 第二期

(总第五十七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 管：政协福州市委员会
主 办：福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福州文史》编委会

主 任：林恒增
副 主 任：林 澄 张大斌
委 员：陈高英 杨 凡 卢 玲
李大林 陈泽山 张振玉
李仲才 唐 希

编 辑 部

主 编：陈高英
副 主 编：卢 玲 李大林
编 辑：陈泽山 唐 希 林丽钦
潘 登 万 瑜
地 址：福州市五四路125号
邮 编：350003
电 话：0591-87808927 87831257
传 真：0591-87816430
电子邮箱：wswb@sina.com
印 刷：福州雄胜彩印有限公司
刊 号：闽内资准字A第031号
印刷数量：1500册
发送对象：系统内发送

我的少年时光

◇何康口述 何达、何迪整理

编者按：何康先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曾任国家农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等，是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何先生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投身爱国主义运动和抗日战争；在和平年代发挥自身知识优势和管理经验，扎根南疆，创造性地在荒滩上办起草棚大学，产学研一体，解决战略物资短缺问题；在农业部任职期间，带领大国解决百姓吃饭问题，荣获世界粮食奖。何先生在他风华正茂的年代为党为人民和社会激情工作。其人格养成和理想信念形成和其早期经历与家庭熏陶有关。何先生热爱家乡，心系家乡，兹转载《老相片》135期上回忆文章，供以飨读者。

——编者

“远游良多艰，壮心未能已”是父亲何遂十五岁时写的一首诗中的结尾两句。六十年后，他重抄此诗时，加了一段注：“此于1903年，由蜀返闽，舟过瞿塘所作。今已历六十年矣，以生平遭际一何近似乃尔。”回望一生，用父亲这首诗描述我的少年时光也是很恰当的。

父亲何遂

尽管父亲是福建人，但与北方，特别是河北结下了不解之缘。1907年，他十九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为陆军大学）第二期，与来自直隶高阳的孙岳同班，并与他成为挚友，孙岳后来成为我大哥的干爹。就在这一年，父亲在孙岳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父亲作为北方革命党人、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亲信参谋参加了起义，在石家庄截断了清廷南下的军火列车，有力地配合了武昌起义军的行动。1915年，应北洋政府黎元洪的邀请，他回到北京，任陆军大学教官，后被派往欧

洲观战二十个月。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父亲作为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冀南镇守使（俗称大名镇守使，辖42个县）孙岳的参谋长，又回到了河北，驻守邯郸。1923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我在大名降生了。在我满月的照片上，父亲写道：“小三以正月八日生，方面大耳巨头，目光耿然有神，啼声极大。命者云是富贵寿考相。年十八即当发轫，为社会英终其身，无蹇运也。”看来，父亲对我的出生与未来寄托了很大希望。

母亲只管生孩子，自己不带，将我交给了从保定来的奶妈高爱带着。而父亲是个待不住的人，在我尚不记事的幼儿时他四处奔走，干了几件大事情。头一件是参与策划了1924年的北京政变，驱逐了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将小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迎接了孙中山北上；第二件是当了一年北洋政府的航空署署长，开辟了西北的航线；第三件是受了蒋介石的委托，说服直系军阀靳云鹗等反水，配合了北伐，深得蒋介石的赞誉。



我满月时的照片。右一为大哥何旭，左一为二哥何鹏。



时任北洋政府航空署署长的父亲（左一），在开辟西北航线的飞机前和同事留影。



母亲陈坤立（左一）、父亲何遂（左二）带着五岁的我在黄埔军校，牵着我的手的是黄谦。

黄埔军校随北伐进展，一部先迁武汉，后去南京，在广州的校本部急需一位代行蒋介石校长、李济深副校长领导责任的代校务（即代理校长）。蒋介石在几位候选人中选派了父亲，于是1928年春天，我随父母来到了广州。我已经五岁，开始有了较清晰的记忆。那时家住广州长堤，父亲每天早上乘专用的小火轮到长岛上班，副官苏鸿恩总是跟着，另外还有警卫。我还没有上学，父亲喜欢带我去上班。记得一上码头不远就是学校大门，往左走是一幢有宽宽走廊的二层小楼，就是父亲办公的地方；进大门往右走，就是礼堂，父亲常常在礼堂里讲话。此时我在宽敞的校园里玩，礼堂对面的小山上有座亭子，是我常去的地方。父亲穿军装，有时也穿便服。我最熟悉的教官是黄谦，父亲称他菊生，福建人，黄家的孩子黄夏、黄宋，和我们弟兄都很熟，父亲总是把我托付给他。最严肃的是教育长李扬敬。

所有的人包括汽艇上的水手都喜欢我，水手还满足了我提出的驾驶汽艇的要求。

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父亲在办公室用脸盆盛墨，把白纸铺在地板上，用扫帚写下七个大字：“和平奋斗救中国。”父亲很兴奋，先教我认字，又对我说：孙总理弥留之际还念叨这七个字，这是他最后的遗言！这七个大字按原样，刻在了父亲主持兴建的孙总理纪念碑的东侧，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头脑里。父亲还主持兴建了军校师生北伐阵亡烈士纪念碑、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坊中两米多高的碑文是他用颜体楷书书丹的。这些，至今仍为广州黄埔军校旧址中的盛景。

小学生活

大约在1929年秋天，父亲辞职不干了。我随父母先到上海接祖母（祖母本住在上海四叔何缙

家里），然后回到北平住西城察院胡同29号老宅。我进入东铁匠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开始上学。大哥、二哥仍在汇文中学读书。

家很大，前院南房是个大厅堂，前面有很高大的假山石，父亲在假山顶修了一个“慈恩塔”，供着祖母的青丝（头发），后院内宅房子很多。舅父陈裕时住在我家，他是清末湖北革命团体中最年长的同志，因为辛亥时期极力主张向袁世凯妥协，逼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位子让给袁，引起众多党员（国民党员）的不满。袁称帝，他游说湖南汤芗铭、四川陈宦通电反袁。此后他对政治失去兴趣，当了居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号召佛教徒抗日，当时是北平佛教协会的会长。他爱喝酒，经常在家里会见老朋友，还曾请过九世班禅到家住、开讲堂。父亲不管儿女，整天忙着考古，母亲忙着打牌，家中事均由祖母发号施令。为逃避祖母的监管，大哥、二哥经常住在湖北宜昌会馆。

1931年，父母带我和妹妹先坐火车到郑州，转陇海线的专列，经三门峡、潼关至西安。我见一位全副武装的军官向迎上去的父亲行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老师！”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杨虎城。我们被安排住在菊花园，一个四合院。杨虎城的家也住在菊花园，但他每天都坐车到西安新城去办公。杨夫人谢葆真（原名宝珍）漂亮而和蔼，杨的一个儿子杨拯民和我同班（小学三年

级），每天有汽车送我们到学校上学。

父亲看上去公事不多，杨对他很好，有事情总是派车来接去新城，不是开会就是应酬吃饭。平常跟着父亲的有三个人：一个叫叶迺奇，教父亲画国画；一个叫贾班侯，帮父亲练字；另一个叫高尚穆，原本是卖古董的，专门陪父亲找古董，搞考古。

父亲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画画、考古和旅游上，父亲多次带我登上西安古城，踏访“咸阳古道”，游乾陵、华清池，还去了一次终南山。父亲的游兴很浓，专门去寻找王宝钏等候薛平贵的寒窑，发现传说中的那地方立着一个旗杆，旗杆上挂着一个斗——木头制的圆东西；又专门去寻找项羽给刘邦设鸿门宴的地方，帐外也有斗。父亲还带我去渭河边的一片古战场，暮色苍茫，驼铃阵阵，荒草漫漫，父亲让我在地上寻找箭簇。我居然真的找到了一个，青铜的，锈迹斑斑，我幼小的心中突然感到一抹苍凉。父亲的记忆力非常之好，不但古诗词，就是《左传》《战国策》等，也能成篇地背下来，他并不把我当孩子，而是满怀激情、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感受、他的见解，抒发他的感情。身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环境里，听着父亲激情的讲述，我常常感到内心里像种子遇到喜雨般，生发出对祖国广袤大地和悠久历史的热爱。

九一八事变打乱了我们全家人生活的节奏。



黄埔军校苏制飞机前留影。右三为母亲，后面军人抱着的是我。



父亲在黄埔军校和同事一起规划作战时的情形。

大哥从沈阳逃回来，讲述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经历，他像换了一个人，发疯一般投身学生抗日活动，他是我们弟兄的“领头羊”，二哥总是紧跟他走，我则跟着两个哥哥走。

他们多次带我去参加抗日集会，其中有叫“飞行集会”的，就是在热闹的大街上突然集会演讲、唱歌，警察一来，就一哄而散。大哥和二哥一人拉住我一只手，跑的时候，我感到真的是足不沾地。大哥、二哥经常在宜昌会馆里刻蜡版，印传单，有时塞给我一沓，让我到学校去散发。我就起个大早，到学校时教室里连一个人都没有，我就把传单一张张放进空着的课桌里。我学会了不少抗日歌曲、进步歌曲，我最爱唱的是《少年先锋队歌》，每天一觉醒来我就高唱：“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我最喜欢的一句是：“通红的炉火烤干净了我们的血汗！”记得约在1932年春节前后，父亲带着大哥到前线去慰问东北义勇军了。傍晚时分，家里突然闯入多名黑衣大汉，黑色的长衫、黑色的帽子，有的拿短枪，有的扛长枪。他们不由分说，把全家老小都赶到后院厨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里，说是要“借盘缠”。妈妈怀抱达弟护住祖母，很平静地说：“你们要钱财，家里的东西随便拿，但不能伤人，伤了人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大哥不在，二哥是年龄最大的，他想借敬烟去夺看守的枪，又想溜出去报警，都被母亲制止了。天黑下来，直到躲在外面的花把式（花匠）进来，才知道强人已经走了。母亲清点财物，发现只少了父亲在欧洲观战期间英国人发给他的一枚勋章，还有一只苏联代表团赠送给他的水晶盘子，我记得盘子里有一片绿叶，叶上有一只昆虫，工艺很细的。还有几件并不值钱的东西，显然这不是劫财。父亲接到电报回来，愤愤地说，这不是抢劫，是恐吓！后来透露出，来抢的人中有北平行营卫队中的人。从此家里多了几名保镖，走江湖的，会打拳，常在院子里一展拳脚。

1933年热河失陷，父亲已决定南迁，先让我去南京住在黄谦家里，由北平汇文小学转入南京白下路小学四年级，与黄宋同班，走读。那一年



父亲带我参加黄埔军校集会。



全家与祖母孙弄琴在慈恩塔前合影。祖母膝前为妹妹何嘉。

的暑假，全家人到庐山避暑。庐山有个“庐林书院”，是宋代朱熹的读书处，有几个学者在那里办学，既读四书五经，也读现代文，是寄宿制的，要求很严。父亲把我一个人放在了庐林书院，一个月后，全家人都走了。我无人管，一个人在那里天天读古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心里很是悲伤。那时祖母已随四叔住在上海，祖母喜欢跟四叔住，因为四叔会讨她的欢心。我直接给祖母写了一封信，讲自己在这里很孤单很苦，最后画了一个小人，跪在祖母面前。两三天后，我在溪水边洗完脸，回到教室正大念“子曰”，电报就来了，说父亲接到电报：“祖母病重，望康儿归。”于是我到了上海祖母身边。

马尾海军学校

此时，大哥和二哥都在上海。大哥考入了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二哥进入吴淞中学读书，我考入上海南洋模范小学。从1933年暑假至1935年初，我都在南洋模范小学读书，该校很严格，一律住校，每四个星期回家一天，学生不许在校吃零食，家里送来的东西一律放在训导处，每天下午四点，一个学生发四块饼干。学习方面，要求非常严格，五年级上学期，开始念英文。1935年上学期，我考入了南京金陵中学初中

一年级，这时全家已迁至普陀路四号。我上学不久，突然发烧，是肺病，于是休学。从3月到暑假，我到杭州莫干山四叔的别墅里养病。四叔很有钱，不但在上海、杭州有房子，在莫干山也有两幢别墅，姑姑、祖母都住在四叔家。此时，海军部要办所模仿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学校的福建马尾海军学校，从多省招收学生。海军部部长是陈绍宽，福建人，当年与父亲同去欧洲观战的海军上校，参加过英国和德国的海战。父亲从他那里获得消息时，福建的名额已经满了，我就用湖北（舅爹所在地）的名额、以贡噶活佛保送的名义参考。一共只收一百名学生，每个省两个名额，五十名学航海、五十名学轮机。考场就设在海军部里，考试由陈绍宽亲自主持，我有点近视，在测视力时，陈绍宽把我推前了几步，最后我考入了轮机班。学制八年，完全是英国式的，航海班念五年书，上舰实习三年；轮机班念六年半书，上舰实习一年半。考进去的学生军衔是上士，实习时是少尉，毕业时是中尉。毕业考前十名送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学校深造。学校的地址就在福州马尾港，校名是“海军部海军军官学校”。我考取了轮机班，在家里一下子成了小英雄。按规定满十四岁才能参考，二十二岁毕业，当时我十三岁多一点，差一点。

记得是1936年6月出发，我剃了一个小光



父亲（右二）访
鸿门宴旧址。

头，发了两套制服、衬衣、皮鞋、袜子、白色的包。两套制服中，一套属礼服，在检阅或举行重要活动时穿，另一套较差，平时穿，帽子是黑呢子的，帽檐外面有一道白色的箍。陈绍宽非常注重仪表，每一个铜扣子都要擦得锃亮。父母亲自送我去报到，几日后，我乘坐“通济”舰赴福州马尾港。“通济”舰是一艘练习舰，排水量一千九百吨，有高高的桅杆，动力为柴油机，时速十五海里。

我们住的船舱在甲板下，双层床，一个人发一个铁罐子放东西，四个人一间屋。早点名，晚点名，吃得也比较好。五十个人为一队，学生中有队长和副队长，教官是个上尉，姓蒋。刚开始在长江里航行，顺江而下，船行比较平稳。出了吴淞口，驶入大海，船便大摇起来，所有的学生都吐得不亦乐乎，我还算好的。走了三天，过舟山，到了马尾。马尾是个军港，学校就在军港的旁边，大门前有一棵大榕树，进门摆着一尊钢炮，一条长廊，房子是二层楼房，品字形，四方的院落。楼上住宿，楼下为教室。

校长是一名海军少将，姓李，训导主任叫周宪章，是个上校，是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学校毕业的。教官均为中校或少校，还有四名英国籍教官。学习和生活纪律都抓得很严，除了语文念古文、修身课念四书五经，几何、代数之类的数学课也要学，包括实验课都讲英文，授课的也多为英国教官。1936年8月末，学生到齐，分为一个个队，分别叫“成功队”“则徐队”“宗棠队”“继光队”等。学习抓得很严，每学年考两次。一般上午是文化课，下午游泳。刚开始在大游泳池游，而后乘运输舰到近海，在海里游。一年级五百米及格，每多游五百米，奖励大洋一元，游泳不及格便除名。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整理内务，下午放假，可到马尾市里去吃一点米粉。一出校门就要换上礼服，每个铜扣子都要擦洗锃亮，皮鞋也要擦得锃亮。

向往延安

这期间，我在上海南洋模范小学读书时的一位姓张的同学，家里是资本家，他寄了很多书报

给我，我的大哥、二哥也不断寄一些报刊给我，所以我成了同学中消息最灵通的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二哥寄来大量报刊，同学们得知消息，群情激愤，纷纷要求走出校门游行，表示支援抗战。校长对大家说：“这只是局部战争，相信上峰会妥善处理，你们都是学生，军校的学生就要安心学习，不得参与外面的各种活动。”

这时候，我与同学何世庚、赖坚组成了一个社团，名叫“三人”，就用钢笔在稿纸上抄小字报，在同学中传阅，看到的人当然并不多。我们又发展了一个同学，叫谭毓枢。

八九月间，日本来空袭马尾军港，军港损失虽然不大，却吓坏了学校领导，因为学校就在军港旁边，他们觉得不安全，于是将全校迁到了离马尾约二十里路的鼓山涌泉寺。从此，我们便在涌泉寺大门口的场地上操练，用竹篾子挡住菩萨，在大庙的佛堂里上课了。

自从迁入涌泉寺，学校就很难管住学生了，一帮子小皮猴，有的学生挤到和尚身边去打坐，还可以混上菜包子吃，和尚不敢惹这帮军哥，后来干脆蒸了包子送给军哥们吃。



父亲（山上居中者）与义勇军将领冯占海（山下居中者）等合影。

校方的管理松弛了，学生们便满山遍野地开小会。此时，大哥、二哥还有上海的张同学不断寄来各种宣传抗日的材料，我发现其中有范长江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如获至宝，由此知道了在陕北有红军，这时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家庭方面说，由于父亲思想比较开明，家庭氛围是和谐而民主的。我读了一些托尔斯泰的小说，特别是《复活》，深受托尔斯泰“勿抗恶”思想的影响。而此时，我还读了讲述产业革命的图书，有了阶级的观念。在“三人”小团体中，何世庚家是城市贫民，父亲是个工人，很早就劳累而死了。他讲到他父亲死的时候，脸是蜡黄的，家徒四壁，墙也是蜡黄的。我便对阶级有了实际的感受，何世庚一家就是下层，而自己是生活在社会上层的，这就是社会的不平。我的思想朦朦胧胧开始从“勿抗恶”转向要革命，要改变不平，这是思想升华的一个起点，但不是很清晰。更为现实的是，学校不许学生抗日，而共产党是主张坚决抗日的，于是萌生了到延安去的想法。

这时，学生已经发了枪，每天要在大庙前面的广场上操练。下午不上课时，“三人”便跑到“喝水岩”开小会，抗战了，海军却上了山，我们不能再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了。我们一致决定走，可如何走呢？学校有规定，考试不及格就开除。所以，我们决定到大考时罢考，交白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走了。

我们开始做准备，考虑到北方冷，便把学校刚发下来的棉褥子里的新棉花抽了出来，买了布，准备到马尾城里一人做一件棉大衣。再把床上铺的被单刷上一层桐油和一层绿油漆，做成了绿油布。我与谭毓枢拿着东西，下山到马尾城里去找裁缝铺，刚好被队长看见，我们不顾阻拦地跑了。回来以后，就被叫到训导处，李校长和周教导主任对我说：“你的父亲拜托过我们，你千万不要乱闹，犯了事，我们也帮不了你。”为此，学校以擅自离校为名，给了我和谭毓枢各记大过一次处分。我们依旧每天只穿一件单衣，去爬山练脚力。

终于到了年终大考，我们原本准备故意考不及格，明明会答的题目，故意瞎答。考到最后一天，休息时，同学们唱起了抗日歌曲，队长是一个上



父母带我们游过庐山、黄山、终南山等名山大川。坐者左起依次为大哥何旭、母亲陈坤立、二哥何鹏、父亲何遂抱着我。



1936年6月十三岁的我复学了。



共赴延安的同学再聚首。摄于1960年。前左赖坚、前右何进（何世庚）、后左何康、后右何澄石。

尉，他抓住年纪最小的谭毓枢，怒斥道：“为什么要扰乱考场！”说着就要拿竹尺子打谭，我立即冲上去，把竹尺子抢下来，大喊：“不许打人，我们唱抗战歌曲有什么错！”那个上尉怒吼道：“你怎么敢对长官这样？你出去！”我说：“出去就出去，我们不考了！”我愤然走出“教室”，好几个同学跟我一齐走了出来，罢考了。很快，学校就张贴布告，说我临场犯规，侮辱师长，着即开除，限二十四小时以内离校。当天下午，我与谭毓枢、赖坚、何世庚等背上绿背包，高唱抗日歌，昂首挺胸，大步走下了鼓山。走到半山腰，听到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这天正是12月25日，圣诞节。

我有一个叔叔住在福州仓前山，我们便先集中借住在他家两天。大家一算账，如果乘船坐车去武汉，钱根本不够，不满十五岁的我与谭毓枢年龄最小，就让我们两人乘船坐车去，赖坚与何世庚联络其他要去的同学共约十人，组成一个宣传队，步行去。

1937年12月28日，我与谭毓枢乘装有发动机的平底木船从福州溯闽江直达水口，上面的河道就窄了，只能换乘小船，也是机器驱动的。到达南平后上岸，改乘汽车到建瓯，再换车到浦城，辗转到达江山。江山已属浙江，是浙赣路上的一个大站，我们一算账，发现买火车票的钱不够。不过，此时浙北的杭嘉湖已经失守，大批难民拥到这里，整个火车站乱成了一片，根本无法买票，谁有本事谁挤上车。我与谭毓枢带着四个包爬上了一列火车的车顶，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开了两三天才到长沙。

我知道大哥二哥所在的外国语补习所已迁至长沙的岳麓山庄上课，便到那里找到了他们。大哥、二哥见到我很意外。我告诉他们，海军学校一打仗居然上了山，我们要抗日，准备到延安去。大哥二哥也觉得国难当头，再在后方学外语没有意义。于是在岳麓山住了两天后，他们和我俩一起从长沙乘火车前往武汉。由于突然咯血，母亲担心我肺病复发，将我扣在家中，第一次去延安的努力因此中辍。



从马尾海军学校出来后，我找到在长沙外语补习所的大哥何旭（右）和二哥何鹏。

“抗宣七队”

不久，大哥随父亲到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当了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机要秘书；二哥则通过林伯渠的秘书林居先介绍，到延安进入了抗大第四期。父亲带我去汉口的租界中街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我知道了“孩子剧团”，并于1938年春节加入了“拓荒剧社”。

我接到通知，带着简单的行李到武昌的育婴堂集合，同行的有我舅爹的女儿陈怀端（我叫她端姐）和谭毓枢，到了武昌育婴堂才知道，“拓荒剧社”已正式改为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抗宣七队”，后来更名为抗敌演剧第三队，归政治部第三厅领导。队长光未然（张光年）尚未到任，由副队长徐世津和另一个副队长王虹梓主持，在他们之后，赵辛生（赵寻）、彭后嵘也担任过副队长。队员里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人艺的著名演员田冲、胡宗温、胡丹沸、郭析零、史民、兰光、田雨、黎霞（后在山西牺

牲了)、陈璧(陈怀端)、钱辛道(画家,日本留学生)等。后来,“抗宣七队”在光未然的带领下渡过黄河,奔赴延安。由此,光未然写下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由邬析零担任指挥,“七队”在延安做了《黄河大合唱》的首场演出。

在“抗宣七队”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德佑,他的父亲周苍柏是湖北武汉著名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也是剧团的主要资助者,捐了二千银元。周德佑参加“抗宣七队”时,只给父母留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行事的果断。周德佑当时只有十八岁,却已是共产党员了,而且是徐世津的主要助手。他的姐姐周小燕是著名的歌唱家,哥哥周天佑是钢琴家。他见我与谭毓枢年纪小,对我们十分关照。

春节后,我们坐汽车从汉口出发,一路上雨雪纷纷,第一站是汤池(温泉),那里有一个共产党主持的训练班,负责人是陶铸。我们在训练班住了半个多月,听了形势报告等,一边政治学习,一边排练节目。生活上是实行共产主义,每个人带的钱全部交出,由负责生活和财务的副队长王虹梓管理,王虹梓的夫人汪霓也是队里的演员。每个人每月发两元零花钱,每天每人的菜金是一毛二分。这期间,周德佑主动借给我好几本书,有高尔基的《童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莱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这些书完全把我吸引住了,连上厕所手里都攥着一本。

过了半个多月,我们进发到应城。应城有一个膏盐矿,竖井打入地下,一层石膏一层盐,把石膏采上来,把水注下去,盐溶于水,再把水吸上来,晾晒,浓缩,整制成一块一块的岩盐。矿主很有钱,听说从武汉上面来的,给我们摆了丰盛的接风宴,而且把附近一座富丽堂皇的法国教堂的神父请出来作陪。看起来,他们的生活是很奢侈的,一个个都穿着缎子做的长袍马褂。可是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我和周德佑、谭毓枢都到一二百米深的膏盐矿看过,工人几乎是赤裸的,终日不见阳光,而且巷道低矮,直不起身子来。联想到矿主奢华的生活,内心产生了强烈的



“抗宣七队”合影。后排右一是我,左一是胡宗温。



周德佑所作“抗战演剧第七队”部分成员漫画手稿。前排为周德佑(左)、徐世京(中)、田冲(右),第二排为赵寻(左)、邬析零(中),后排左一是我。

不平。这期间，我的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进一步抛弃了“勿抗恶”的理念，产生了要起来反抗，改变社会不平的想法。

我们到应城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膏盐矿，向工人宣传抗战的道理。后来，许多工人通过汤池政治训练班的培养，转到新四军去，有的成了新四军的骨干。

在应城待了约一个月，我们又去皂市继续演出。由皂市继续到六七十公里外的天门县，正好赶上下雨，道路泥泞，全体团员艰难地步行了两天才到，住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大家都累坏了。此时，天门附近岳口镇一支由土匪收编的部队殷切地要求我们去演出，队上决定战胜劳累去作抗日宣传。我们就在岳口镇汉水边上搭了台，白炽的汽油灯很明亮，所有演员都很卖力气。我们仍然演周德佑编剧、徐世津导演的抗日剧，我扮演的抗日小英雄被日本兵抓住了。演日本兵的是高高大大的田冲，当演到“日本兵”用皮带抽我时，他糊涂地把皮带拿反了，用皮带的铜头抽我，疼得我真的大哭起来，表情极为真切。在白炽的汽油灯下，黑压压的士兵们有的愤怒地举起了枪，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田冲下场后，抱着我说：“我弄错了，我错了！”我一生都记得这件事。

在天门县，周德佑病倒了，发高烧，当地医疗条件差，徐世津派人把他送回了汉口。但不久，噩耗传来，周德佑竟因伤寒病加过度劳累，医治无效，去世了。我记得1938年3月20日《新华日报》为此出了专版，刊登了他父亲周苍柏和母亲董燕梁的讲话。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都参加了葬礼。周德佑非常关心我，一路上帮扛东西，借书给我，还把他用小字写的学习笔记、作的诗歌给我看。他是我的启蒙人。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全队一片哭声。直到现在，我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悲痛不已。

在天门县期间，副队长徐世津还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就是另一位副队长王虹梓和汪霓携款潜逃，把周苍柏捐给队里的两千银元和大家上缴的钱全部卷走了。徐世津说，王虹梓吹嘘他是坐过大牢的左翼文人，但现在查明，他只是上

海的一个文化痞子，他被逮捕坐牢是因为桃色事件。他生活腐化，大家反映他经常和老婆下馆子、开房间，看到风声不对，便卷了大伙的钱，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件事对全队的打击很大，但大家并没有屈服，一路边筹钱边演出宣传抗日。先到岳口，乘船溯汉水而上，到达钟祥县。县政府比较友好，支持我们在县政府里演戏，给我们做饭吃。我们吃得狼吞虎咽的，因为从岳口到钟祥，为了补助



1938年，我在武汉到重庆的船上过三峡时留影。



五兄妹于重庆合影。左起依此为小妹何嘉、我、大哥、小弟何达、二哥。摄于1939年12月。邱崇禄提供

队里的经费，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参加了拉纤挣钱，体力消耗很大。数日后，钟祥县的领导用小汽船把我们送到了襄阳。就在从樊城到襄阳的路上，我突然发起了高烧。

襄阳是个较大的城市，医疗条件比较好，检查发现，我得了伤寒症，肺部还有阴影。前有周德佑的教训，徐世津立即派人顺汉水把我送回武汉，暂住在武昌的“海光农圃”里疗养（海光农圃原为周苍柏的私家花园）。那里有一幢小洋房，一位姓戚的大姐负责管理，周德佑的坟墓就在东湖的半岛上，在楼房前面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爱儿周德佑之墓”。周德佑的父母和姐姐周小燕都来看望我，很是关照。我身体基本康复后，才回到汉口的家。随抗宣七队奔赴延安的第二次努力再次受挫。

回想起来，这期间还有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大约5月下旬，父亲很郑重地让我把一个密封的文件亲手交给邢契莘伯伯，邢伯伯也住在江汉关附近，他的女儿邢文蔚、邢文燕都和我很熟。当时，宋美龄是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会长是蒋介石），主持该会日常工作，邢契莘是宋的主要助手（邢是美国留学生，作风西化，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我当时并不知道文件的内容，只是遵嘱把文件交给了邢契莘伯伯。后来知道，父亲早在5月中旬就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提出了决黄河堤，“以水代兵”阻止日寇利用豫东平原的有利地势，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沿陇海线夺取郑州，再沿平汉线攻占武汉的计划。父亲还曾带大哥去开封向商震（三十二军军长、河南省主席）讲述他的建议，并把这个建议交给了林蔚，请林直接递交蒋介石。此时，因见我方局势极端恶化，所以才让我再一次去送材料。另一件是家事，父亲从南京带回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我见到了这位姓于的女子，长得不错，衣着朴素，神态和举止是文静的。母亲说，她不是烟花女子，是逃难，她还有一个姐妹，都是由父亲带出来的。母亲认了，给了她红包和首饰，摆了一桌席，对近亲们宣告她就是“二房”。可是才两天，这个女子就走了，留下一封短信，说她感觉

到这个家庭是很和美的，不愿因她而破坏了这个家庭的和谐与幸福。

加入共产党

大约在8月份，举家入蜀。大哥、二哥已去延安。我、小妹何静宜（何嘉）、达弟、高妈和徐祖善一家，包括徐伯母吴凤仪、姨太太小梅、徐鸣，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火轮最上层的头等舱，溯江而上。我在夔门还照了一张相。

此时，我很懊丧，好像自己离了队。到了重庆，我仍然想去延安，妈妈哭得很厉害，不想让我离开她。父亲对周恩来说，我两个儿子都去了延安，老三再走，我就很为难了。博古把我带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谈话，打消了我去延安的念头。



1973年，兄弟重逢。左起依次为二哥、大哥、我和妹夫邓裕民。

我考入了由天津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校长是张伯苓，后校名改为“南渝中学”。我上高一，妹妹何静宜在初中部。张伯苓很开明，学校的气氛比较活跃，语文老师姓周，对我很赏识。蒋介石夫妇还到学校里来过。当时我家住在“云庄”，是丁春膏的房子。我住在学校。我连续写了多篇文章介绍我在“抗宣七队”的生活，特别是我在膏盐矿的见闻。这些文章被张贴在壁报上，很快引起了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注意。有一个高二的同学叫王世堂是共产党员（后脱党），他的父亲王勇公（王孝缜）是我父亲辛亥



20世纪80年代，抗宣七队队员在我家重聚。左四为田冲（后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左六彭后嵘（后为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左七是我，左八郭析零（后任中央歌舞团团长、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左十赵寻（赵辛生，后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左十一胡宗温（后为北京人艺演员），左十三张光年（光未然，后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右一我的夫人缪希霞。

革命时期的战友，他约我到他家吃饭，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作了很积极的表示。从此，我经常被约到大操场的球门边谈话，由我的妹妹何静宜在远处放哨。我的入党申请就是趴在操场的讲台上写的。

记得是1939年5月22日，王世堂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1939年6月9日晚自习后，在学生宿舍后面一个农民的场地上，面对在一块大石头上贴的事先画好的马克思画像，我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入党介绍人是王世堂和齐亮（齐亮是山东人，出身城市贫民，他曾是西南联大共产党的负责人，解放前夕牺牲于渣滓洞），参加人还有郝连杰和邓鸿举（高三学生，比我大两岁，时任支部书记，后来更名邓裕民，50年代初成为我的妹夫）。此外还有梁淑敏（女）、刘慧兰（女）和雷学诗。

我入党后不久，风声突然紧了起来。因邓鸿举太活跃，首先撤出，跑到化龙桥的新华书店去当营业员了。经他推荐，全体党员选举，我这名新党员继任了南渝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属沙磁区（沙坪坝、磁器口地区）特委领导。放暑假前，我被通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参加由蒋南翔主持的“沙磁区学生党支部负责人的培训班”。到了红岩村，没想到遇到徐鸣和我在同一个培训班学习，这位大我两岁的发小也加入了共产党。

“跑警报”时，在防空洞正巧碰上了叶剑英和吴博，吴博是二哥在上海吴淞中学的同学，二人很要好，她常到家中玩。她见了我非常亲热，仍管我叫“小三”。叶剑英这时知道了我也像两位哥哥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博告诉我：“你爸妈还和叶参座提到了你大哥、二哥，说十分想念这两位去了延安的儿子。”

这年年底，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大哥、二哥分别从晋东南抗大四大队和闽北回到了重庆，我们兄弟三人分别一年多后又团聚在了一起。为了遵守保密纪律，没告诉他们我也入了党。所以他俩去曾家岩见叶剑英时，还责怪我不告诉他们我已入了党，叶剑英笑着说：“你们让他来找我，我替你们打通关系。”再见到我们时，叶剑英交代大哥、二哥都不要回去了，留下来通过父亲及父亲的社会关系做上层的统战工作。在叶剑英的安排下，我们兄弟三人成立了特别的党小组，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1940年冬，又由叶剑英将我们的关系交给了董必武。董老见我们时，要求我们广交朋友，好好学业务，长期潜伏，待机而动。大哥、二哥都有社会职务，而我正要上大学，听到我有志学习农业，董老特别鼓励我要好好学，将来我们的工作需要专业人才。从此，我们三兄弟直接在叶剑英、董老的领导下，作为一枚战略棋子部署下来。

郭阶三家族的台海情

◇ 郭 震

郭阶三家族远祖，于唐末咸通年间（860-874），随李唐王朝皇亲国戚跨山涉水，南迁福建。他们慑于闽地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而将安居目标锁定东南沿海，首站到了长乐，家于芝山，并奉邠州所立汾阳郡王、令公郭子仪香火而至，于六平山麓盖庙而祀。庙号“福惠”，后更名“汾阳”沿用至今。此后，这支郭氏族人又迁徙至福清后洋，也是面海之处，晴好天气举目可见平潭岛。北方人南迁，多聚居于海岸线上。一是海岸线上地势相对平坦，可以农耕，又能讨海，这些优势成了吸引他们聚居的首选。另外，“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又涵养了他们博大的胸怀。

在海边住惯的人们，自然而然又把眼光投向四面环海的台湾岛。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台湾尚未开发，原住民不及10余万人，但自康熙年间设府以来，已有200余万闽、粤等地居民移居台湾。到晚清，越来越多的闽人与中原人游宦台湾，联姻、交友，台湾岛与大陆已是水乳交融。郭阶三家族数代人奉命出使台湾，或兴学、或抚垦、或办实业，与台湾山川、士民延续了割舍不断的台海情。

福州乡贤，郭阶三之四子郭柏苍有孙女出嫁台湾进士、翰林黄彦鸿为妻，即《光绪戊戌科会试进士齿录》里“黄彦鸿齿录”所记“元配郭氏”。黄彦鸿子黄浚称郭柏苍为外曾祖父，称郭柏苍侄孙郭春榆（曾忻）为舅父。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13年版）记：“外曾祖兼秋先生（柏苍）以博学多能闻于乡，雅通诸艺，于山川形质，物产良楮，旁逮草木鸟兽之微，无不精究。使在今日，不为地质制造专家，亦当为农林牧艺大师矣。予六岁寄居外家，读书玉尺山房，所闻先生绝学轶事，不可殫记。”郭则沅（蛰云）是郭春榆长子，郭柏荫曾孙，光绪癸卯进士（同榜有台湾进士汪春源），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官至吏部侍郎，行尚书事，晚年入厦门鼓浪屿菽庄吟社，“台湾进士施士洁、许南英、汪春源皆其文酒交”也。

郭阶三之二子郭柏荫，更是无比关注台湾政情。道光十八年（1838），郭柏荫正由浙江道御史转掌山西道。但他对家乡闽省对面的台湾岛的情势了如指掌，并异常关注。中法战争前（1884），台湾作为一个道隶属于福建省，管治相对薄弱。鉴于1874年日本国犯台事件，郭柏荫深谙：若不强化台岛管辖，虎视眈眈的世界列强仍有染指台岛的可能。因此，他于道光十八年初上奏朝廷关于加强台湾管治的诸项事宜。此奏折引起朝廷重视，道光皇帝作了朱批。

据《清实录》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六日记：“谕军机大臣等，御史郭柏荫奏条陈台湾事宜一折：该府孤悬海外，民番杂处，奸宄众多，宜择廉明公正之员，方足以资抚驭。至于稽察匪徒，盘查仓库，清案牍以省株连，严巡防以惩偷渡，杜顶冒以重操防，所奏各条，着钟祥飭该镇道体察情形，会同妥议具奏。原奏着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钟祥为当年闽浙总督。

当时，朝中一些大臣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倒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但郭柏荫并不苟同这些无所作为的观点，并针对台湾、漳、泉等地治安混乱的情况，又再度上奏朝廷，再次获得皇上御批：“闽省械斗之风所在多有，泉、漳二府为甚。台湾地居海外，民情浮动，易生事端，必应预备储蓄。着钟祥、魏元烺即将该御使等折内所奏各事宜体察情形，悉心筹画，妥议章程具奏。”

郭柏荫的第二封奏折，提出4点主张：

1. 对台湾治理要“勤抚慰，严番界，查仓库，禁偷渡”；
2. 防兵丁冒替，戒人命及盗案消弭；
3. 严禁漳、泉二州械斗；
4. 不许鸦片入口，不许内地人民栽种罂粟。

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事，皆交刑部施行，大大促进了台湾当时社会的健康发展。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63册第89页，有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署闽浙总督魏元烺奏遵旨议奏御史郭柏荫条陈台湾事宜。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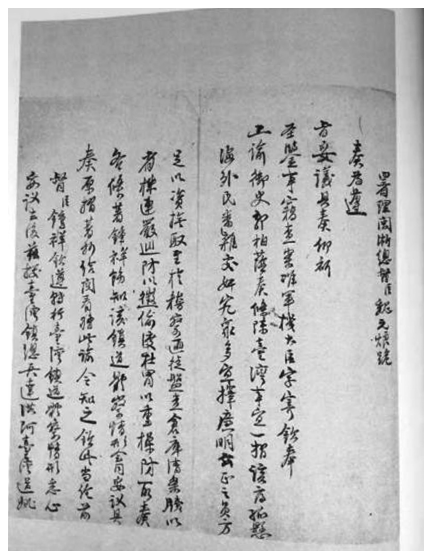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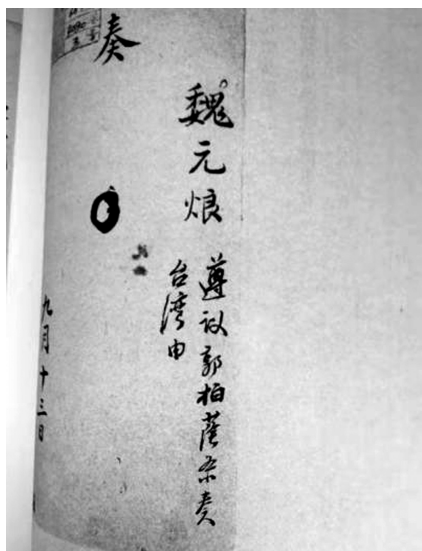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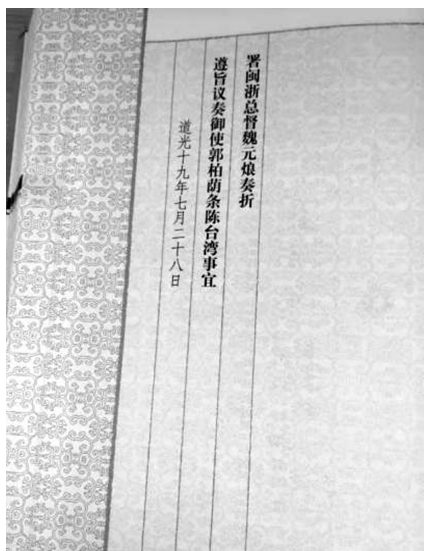
魏元烺是位能臣，自1831年起历任福建巡抚，署闽浙总督，任上多有建树。他遵旨将郭柏荫条陈各项台湾事宜逐项落实，写了数千言之“遵旨议奏御使郭柏荫条陈台湾事宜”之奏折，如积案的处置与落实、府库的清查与补足、通番关隘的建造等，为以后台湾的各项治理打下了基础。

郭柏荫之小弟郭柏芎咸丰元年登科之后，于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国侵犯台湾的危难时刻，勇敢地向海洋进发，到当年还是蛮荒之地的台湾噶玛兰（今宜兰）开辟新学。正如郭柏荫曾孙郭则沅所述：

“合亭（柏芎之号）公所任噶玛兰新学，则跋榛棘甚于远宦，其地属台湾边荒创辟，几与生番杂处”。

合亭公寄和蕙秋（柏苍之号）兄五律云：

“穷海苍茫外，家书一纸还。稍纾孤客苦，差喜冷官闲。俗竞蝇头惯，音谐鹄舌艰。蛮烟和瘴雨，咫尺迫南关。”蕙秋兄回曰：“消息风涛外，忻闻去棹还。家贫忘老大，官小得清闲。习俗维新亟，人文创始艰。惠休有兄弟，应更忆乡关。”柏芎与柏苍弟兄俩意气相投，关系密切，柏苍的许多著作，柏芎是参与者，如《乌石山志》。此次五弟远赴台湾噶玛兰开辟新学，为兄者对其多有鼓励。



二兄郭柏荫也以“嗣合亭公俸满调莆田彻寄诗”致合亭公，诗云：“边庭戎马几时休？南北灾荒事可忧。薄俗安能谐老眼，冷官正好续前修。高斋昼永开棋局，小院春寒展酒筹。不及联床听夜雨，枹阴岂是挂冠秋。”此诗也透露出远堂公忧患国是的拳拳之心：虽请辞在家，时事危局仍耿耿于怀。值幼弟回省，便怀念少时兄弟一起读书时“联床听夜雨”之美好往事。正是诸兄长有了可贵的海洋视野，因此皆支持幼弟往海外拓荒。

而作为博物学家之郭柏苍，有感于当时志书在收录闽、台两地物产时存在的强求循古、夸多失伪、互相抄袭的弊病，遂萌发了撰写《闽产录异》一书的念头。在此书写作中，他视台湾为自家乡土，如数家珍地大量记述了台湾之土特产。该书收录台湾土特产近百余条，仅卷首一章中便引述了许多台湾物产，如：

谷属：闽谷以福州为最，泉、漳、台湾次之。

好谷：即香米。出漳属各县、台湾、汀州。

乌米：脱梁使乌。其最益人者，即乌皮也。须良田、粪美、农勤三者备。方有获，产台湾。

这也说明了当时，闽、台两地物贸的通达，交易的频密。

郭阶三家族中致力于台湾治理与建设的除了郭柏荫、郭柏苍、郭柏芎一代人外，还有他们的后人，如：郭咸熙、郭宾实、郭雍等一批人。

郭绩昌（1847-1898），号咸熙，郭柏心三子，清同治癸酉（1873）举人，襄办台湾抚垦事宜。1890年以大挑授福建上杭县学教谕，后调补台湾凤山县学教谕。又后“经台湾邵中丞、林钦使（指邵友濂、林时甫）聘充文案”。1895年，曾“与提督刘永福防守凤山”。当《马关条约》签订后，郭咸熙被迫离台，“旋里之日，士民至牵衣泣别”。晚年“痛国事无所为”，辞不赴福建永安教谕任和“江西胡中丞”聘，“家居课子，以养余年”。

郭名昌（1851-1901），号宾实，郭柏荫三子，光绪壬午（1882）举人，拣选知县。郭名昌在台湾先后游于刘铭传、唐景崧幕中。因“襄办台湾抚垦出力，保奏同知衔，候选知县。军功

保升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并赏戴花翎。事竣奏奖，奉旨赏加知府衔以直隶州知州指分湖北。”据《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陈衍于1886年“九月，赴台湾刘爵帅抚部之招”入幕时，郭名昌已在巡抚刘铭传幕中。翌年，陈衍因故不得已于“岁暮辞归”，郭名昌则仍居幕中。光绪十七年（1891）刘铭传告病辞官而去。邵友濂接任巡抚，唐景崧升任布政使。光绪二十年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正式当上了包揽行政、军事、监察等大权的省长。唐景崧就任的1894年7月25日，甲午中日战争已打了两个多月了。次年清军遭到惨败。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郭名昌不得已回到大陆，领命赴湖北汉阳任职。1907年卒于湖北汉阳县沙口滂厘局公寓。

郭阶三后裔几代人台湾情愫有其深刻之历史渊源，自明朝始，闽省郭氏开始迁徙台湾，如今汾阳郭氏已成为台湾第十四大姓。在侯官郭阶三家族移居台湾的大批人中也包括笔者长兄郭雍，他们对促进台湾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郭雍1948年赴台北大学求学，毕业后滞留台湾，后任台中油公司（台不设石油部，以此公司代之）副总裁。他主管的台湾石油开采与炼制工艺蜚声全球。上世纪70年代，他不仅率团至利比亚等国向世界展示了这方面的先进技术，还协助前苏联开发了库页岛的油页岩。80年代，他帮助解决了福州煤气生产中遇到的降耗与提效难题。此外，他还在国共沟通方面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叶选平与福建省主要领导的会见与宴请。

郭阶三家族数代人倾心于台湾事务以及浓郁的台海情，实属难能可贵。正是有了像郭阶三家族这样具有深邃闽台情缘的无数家庭，织起了台海之间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使台湾脱离祖国成为一些妄人的痴心妄想。

（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陈孔立先生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汪毅夫先生为本文作者提供文字及图片等历史档案资料，并给予指导。专此鸣谢！）



一中北峰分校老照片

我与福州一中的情缘

◇晏露芙

我与福州一中结缘始于1973年夏天，教务处的康强老师是我认识的福州一中的第一位老师。

跟着康强老师学打字

我是1967届福州三中初中毕业生，也就是当年所谓的“老三届”初中生。我们那届同学是1964年经过初招统考被录取福州三中的，1966年初爆发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了。1968年提出要“复课闹革命”，我们返回学校不久，上山下乡运动就开始了。最早一批同学于1969年春节前离开福州。我于1969年5月随家姐的同学们一起去了闽北山乡插队落户。

1973年春天，我被推荐担任了村办小学的“民办教师”。当年暑假，家姐通过同学关系，介绍我与福州一中的康强老师认识，跟着康强老师学习中文打字。

康强老师是高中毕业后留校福州一中教务处工作的。50年代初，在一次台湾国民党空军空袭

大陆的时候，康强老师不幸失去了双腿，他身残志坚，凭借一双假肢，克服许多凡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韧不拔地坚持完成学业。在工作岗位上，他严于律己，热心为师生服务，得到学校师生普遍的好评和极大的尊重。

当时教务处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两台中文打字机，科任老师会利用课余时间在这打字机上打出作业练习或考卷。打好的蜡纸就交给康强老师用油印机印刷出来。

教务处的中文打字机中，有一台使用的是市面上统一的按照偏旁部首编排的汉字字盘，另外一台打印机字盘的字模被康强老师根据中文常用词语习惯按照词组联排的方式重新编排过了。用改造过的“词盘”打印机学习，上手很快，但要练出好的手感，必须反复练习。手感好了，打出来的蜡纸不容易破损，印刷出来的文件才能做到字迹清晰，卷面整洁美观。

第二年暑假，我再一次来到福州一中教务处

练习打字。其时，我已经能够熟练驾驭中文打字机了。打出来的蜡纸质量得到要求严格近乎苛刻的康强老师的认可。

跟着康强老师学习，就是想着能够多掌握一项技能，多一个回城工作的机会。康强老师认为以我的学习能力和文化素养，当一个打字员是太“屈才”了。他对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失学经历深表同情，但面对当时的形势大家都感到很无奈。

有一天，有两位新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到教务处找康强老师办理报到手续，我羡慕极了。我忍不住对康强老师说：我要是也能像他们一样来找您办理入职报到手续，那该有多好啊！康强老师鼓励我说，你一定会有机会的！

果然，应康强老师吉言，我于1977年夏天，再一次来到了福州一中教务处，站到了康强老师的面前。康强老师热情接待了我，帮助我办好了新教师入职手续。当我从康强老师的手里接过一沓备课教案纸和一枚白底蓝字的福州一中教师校徽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梦境里一般！康强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晏露芙老师，欢迎您加入我们福州一中的教师团队！”这时的我热泪盈眶情难自禁：我的梦想竟然成真了，我成为一名福州一中的教师了！

站在福州一中的讲台上

1977年9月1日，学校开学了！这是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个学校开学日。我站在福州一中的讲台上，意气风发，百感交集。

1976年10月末，福州市教育局到闽北招募“以工代干”的初中教师，我被推荐并通过了招工小组的笔试和口试，回到了福州。当时教育系统是文革的重灾区，为了解决师资数量严重短缺的问题，福州市教育局举办了“福州市初中师资培训班”，分为语文、政治、体育和“农业基础”等4个班级，对我们这些招工回城的“知识青年”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我参加的是师训班语文班的学习，结业的时候我通过了《中国古典文选》（含古汉语知识）、《现代汉语知识》和《教学实习》三门功课的考试，得到“三门全

优”的好成绩。我被师训班班部分配到了福州一中，走上了讲台。

福州一中是福建省教育厅直辖的省重点中学，在文革前就是全国有名的“高考红旗”，在福建省，能够成为一名福州一中的学生都是令人感到激动、令父母亲友倍感荣光的事情，何况是成为一名福州一中的教师呢？！尽管当时我的父母家人邻居都很兴奋，而我的内心却是非常淡定的。

我在农村结交的曾经也是一位乡村民办教师的好朋友，和我同期招工回城分配在百货商店站柜台，她用充满了怜悯的语气对我说：“难道你在农村当老师还没当怕吗？城里的老师是‘臭老九’还不如乡下的老师呢！”面对好友的质询，我无言以对。我能回答说我喜欢学校的工作环境，喜欢老师这个职业吗？

1977年秋天，国家何去何从的大的战略方针未定，前进方向不明，国家百废待兴。环顾当时一中校园，唯一一栋教学办公综合大楼里找不到一扇玻璃完好的窗户。破碎严重的窗户窗框，甚至就用几根粗糙的板条钉起来。冬天到了，朝北的窗户就请家长帮忙，找几张废旧牛皮纸糊糊了事。夏天考试季，为了保证学生有较好的应考环境，学校出资到冷冻厂购买冰块砸碎了洒在教室的地上降温。教室里的桌椅也断胳膊少腿的残缺不全，黑板表面也是坑坑洼洼的，甚至在学校建筑的外墙上仍然星星点点地布满了文革期间武斗时留下的弹洞。

记得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词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午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江山，今朝更好看。”文革武斗期间，两大派各自占据华侨大厦（遗址位于今天营迹路和五四路路口，是当时福州最高的一座大楼）和福州一中教学楼的制高点，除了架起高音喇叭互相打口水战之外，也真枪真刀干过仗。教室里的课桌椅被拖出去造路障或掩体，外墙面上留下的是真实的弹痕。眼前的弹洞和残败的教学设施，完全是对文革劣迹无声的控诉。

尽管当时教学条件不好，但福州一中的教学



一中老校区

基础还在，教师队伍还在，每天看着坐在讲台下面的64位年轻学生清纯的笑脸和64双眼睛里流露出求知的渴望，我觉得，我们国家是有希望的。我常常站在教室外宽大的走廊上，激情满怀地展望着光明的未来。国家振兴、民族复兴的要义在于人才的培养，我身逢其时，理当倍加珍惜才是。我放弃了1977年参加高考的机会，我决心在福州一中语文教学岗位上好好学习，好好干下去。

福州一中的几位教师

1977年夏天，我们一起分配进一中的师训班同学有好几位，我和体育班的林珠如、政治班的游鼎秀同住在学校3号楼底层的一间集体宿舍，我们朝夕相处，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我被调离了一中，鼎秀老师和珠如老师都在一中一直干到了退休。

开学前，教务处的郑桂瑜主任主持召开了新教师座谈会，新教师们被要求逐一表态，而我是

少数真心“热爱教师职业”者之一，我在发言中兴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令与会领导和同学们印象深刻。

我被分配到了初一年段，具体的任务是教初一（3）班的语文课，同时协助班主任林树中老师做好班主任的工作。林树中老师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刚生了二胎宝宝，正在哺乳期。树中老师关心我，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指导。

郑桂瑜主任在教务处分管文科，是一位令人尊重的长者，桂瑜老师说话轻声细语，做事一丝不苟。他指定了两位老教师帮扶我。黄筠老师指导我制定自学计划，包括读书目录的选定和每个学习单元的要求。卞炳南老师具体帮助我上好每堂课。我要提前写出每节课的教学计划详细教案，经过炳南老师审阅过之后才上讲台。

我们初一年段语文学科每周都要集体备课，每份作业练习和试卷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学校对77级这届学生寄予厚望，几乎一中最强

的教师都集合在了初一年段。语文组的陈日亮、刘一承、卞炳南老师都是当时一中的骨干教师。段长是教数学的周碧英老师，她为人非常诚恳，和蔼可亲。年轻的数学老师李必成风趣幽默，深受学生爱戴，后来成为一中数学学科的栋梁……总之，当时全市中学都是划片入学，一中上下估计这种状态很快就将改变，本届学生如果培养成功，就能证明一中的好名声主要归功于教师，而不仅仅是依赖生源的优秀！

我非常珍惜所处的工作环境和一中所提供的学习条件，认真备课上课，仔细对待班主任工作的每个环节。开学初，郑桂瑜老师几乎每天都去听我的课，有时同去的甚至有2—3个其他学科的老师，包括段长。桂瑜老师连续听了我一个月的课，大约是对我比较放心了，才作罢。

当年一中所有课堂都对校内的老师全面开放，我也有规定课时的听课任务。每个优秀的老师都有他们自己的教学特点，通过广泛听课，我学到了很多。

记得林政慈老师上毛主席诗词课，开篇就是声情并茂的朗读：“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政慈老师的教态非常潇洒，英姿勃发充满魅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刘一承老师知识渊博，温文敦厚，上课发挥很严谨，紧扣教学主题和知识点。陈日亮老师气质儒雅玉树临风，上课喜欢旁征博引，天马行空，自由洒脱，难以效仿。

我曾经连续听过陈淇老师的好几节课，有鲁迅的《故乡》《祝福》和古文《六国论》《触龙说赵太后》等。陈淇老师的国学基础扎实，讲课从“破题”、正文朗读和逐段解析到文章写作特点的归纳和古汉语知识点的讲解……起承转合，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还听过马文光老师的单元复习课。马文光老师讲课重点突出，要言不烦，组织教学相当严谨。

卞炳南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他在作文教学方面有一套思路。他传授给我的“秘籍”是：要求学生写作文，自己要先写一篇。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之下，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上了一堂全年段的学生作文讲评的公开课！

在一中上课、听课和参加集体备课都使我受益良多。我又把这些心得体会及时地很自然地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去。我的每一天都在进步之中，内心感到很充实。

树欲静而风不止

当时我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三餐都在学校食堂用餐。每天早上要到教室带早读，傍晚等学生做完了包干区卫生，我才返回宿舍区。晚饭后批改作业、备课写教案还要根据自学计划写读书笔记，每天都要忙到深夜。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体重轻了7公斤！尽管生活很辛苦，我仍然乐此不疲！每天在三牧坊的天桥上来来去去，感觉非常幸福！

1977年底，国家宣布恢复高考，福州一中当仁不让，面向社会开高考补习班，抽调各学科最有优势的教师为补习班的“老学生”们上课。我们年段的陈日亮和刘一承老师被抽调了，他们原先两个班的语文课落在我的肩上。原有的教学秩序被打乱，课后我还有协助卞炳南老师编写初中年段汉语知识的复习大纲和配套的全套练习题的任务。后来高考补习班扩招，陈日亮老师和刘一承老师全脱产全力以赴上补习班的课，他们另外两个班的课也由我来承担，我甚至上过5个班每周总计30节的语文课！

对学校教务处的安排，我心里是有意见的，但我也应承下来了。当时福州一中在北峰有个分校，全校师生每年都要分期分批到北峰去劳动两周。原先说好去北峰是3个班4个老师，或是2个班3个老师带班的，结果其他两个班的老师都因故不上山，只有我们班上去了，树中老师在哺乳期也无法上山，就只有我一个人带一个班去了北峰。

好在我对自己班上的学生有足够的信心，又仗着自己曾经有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和经验，就独自支撑下来。两周之后，我们安全返回学校。教务处马秀发主任站在学校门口，我刚从大卡车上下来，她疾步向前，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露芙老师，你辛苦啦！”

暑期放假前，全体教师会上安排我下学期跟班到初二年段，会后我到教务处领了课本，就利用暑假时间备课写教案了。到了开学前的集中会上，教师安排重新做了调整，由于编制问题，我没有听到我的名字，心里很难过。

我从小喜欢阅读，俄罗斯的果戈里、契诃夫、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家，深受他们的影响，我骨子里是崇尚自由、民主、平等，且非常自负的。

我找到住院养病的郑桂瑜老师，表达了我的不满和希望重上讲台的心愿。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

今天回想起来，1977年秋天在福州一中任教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记得9月1日开学的那天新华社记者到学校来采访，我站在讲台上的照片被登载在福建日报上。我站在教室外边的走廊上凭栏远眺的画面也常常在我后来的梦里重现。

然而到了1978年秋天，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初一年段在暑假期间被重新编成快、中、慢班。而我任课的初二（9）班是介于中班与慢班之间的班级。虽然课我是有的上了，但经历了许多之后，我的干劲和激情却与一年前有了云泥之别！

年底，相恋3年多的男朋友调回福州，我们准备结婚了。学校给我们在2号楼一层东南角分配了一间约6平方的宿舍。

1979年元旦前夜，由年段长周碧英老师出面，以校工会小组的名义在会议室替我们举办了简单且热闹的婚礼。日亮老师赠送我们“花好月圆”“琴瑟和鸣”字幅，并替我们向陈淇老师索要一副对联。对联中嵌入了我们俩的名字，寄托了陈淇老师对国家对一中和对我们夫妻的美好祝愿：

上国正中兴，定有锦文传山海；

佳园逢盛世，且看雨露浥芙蕖。

1979年9月我被调离福州一中，挺着大肚子去福州师专报到。

福州一中地处城市中心区，校内有宿舍、食

堂和幼儿园，隔壁就是实验小学。有好心的老师私下里劝我赖在学校不要走。而我去意已决，我非常清楚，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何况去留又岂是由我们个人可以决定的？！

在福州一中工作的这段经历我很少向人提起，一直到了2014年的夏天。在那个值得纪念的美好的仲夏之夜，初一（3）班的同学们找到我了！在参加了同学们的聚会回家之后，我激动不已，终于向学生们敞开心扉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发到了班级QQ群。今节选如下：

亲爱的初一（3）班的同学们：

你们好！我曾经多次在梦里遇到我们的聚会场景，但我明白，那都只是一个梦而已。我们相聚不过一年的时间，你们在初二就分班了，同学们也散了。怎么可能再相聚？同学们不聚，怎会有我们师生的相遇？我们的人生轨迹犹如雷雨天气的一道闪电，相遇放电闪光之后便再次复归黑暗……于是，为了我心绪的稳定，我将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境封存起来。那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阶段性失忆症吧。

我真的要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了你们的聚会。这次聚会打开了我记忆和感情的闸门，我怎么可能将你们忘记呢。你们是我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的最好的见证人。

……我始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应该是每个中华儿女必备的营养，而唐诗宋词则是最好的入门。所以，我在课后必须给你们加点小灶。我要求你们每天抄录一首唐诗，课后到组长那里背诵过关，现在听你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强迫你们学唐诗的事情，并因此而感谢我。看来我的良苦用心得到了你们的认可，真是太高兴了。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给予我的大大超过了我曾给过你们的。我要对你们大声说，你们太让我感动了，我爱你们！

爱你们的晏老师

如今我年近古稀，离开福州一中也有40多年了，而许多人和事记忆犹新。

明月松间照 竹林风萧萧

——我与福建农学院魁岐协和大学旧址跨越70年的回忆

◇口述：汪霖晨 整理：林丽钦

一

我原籍河南，年轻的时候在河南开封念书，专业是学农的。这个专业让我以后与福建农学院结下了宿缘。

1948年，开封解放前夕，因为国民党政府怕学生被共产党所利用，就胁迫所有大中学校南迁，我便随校到苏州一带暂驻。1949年4月解放军过江以后，在革命浪潮冲击下，我和几位同学参军，在中国人民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政治部下属的民运部，主要负责调查了解驻军遵守军纪的情况和发动群众支援前线。

十兵团大部队向南进军，于1949年6月底开始行动。从苏州一带出发，到浙江嘉兴，乘火车到浙南江山，翻过闽浙间横亘的大山仙霞岭进入福建浦城县，势如破竹解放了建阳、建瓯、南平，逼进福州。福州于8月17日解放，兵团部及下属各单位立即进驻福州。民运部也从建瓯到古田，从谷口乘汽船顺闽江而下，于20日晚上约十点左右，船泊苍霞洲码头，我们就这样来到福州。

民运工作队主要负责筹粮工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先头部队打到哪，我们就跟到哪。在福州稍事休整，我们又开始筹粮。我们已经在建阳筹过粮，来到福州后休整一个星期，就到了莆

田涵江镇附近农村第二次筹粮。后来大军解放了泉州、漳州，我们紧跟着在泉州的南安两次筹粮。要解放厦门时，我们就到漳浦筹粮。直到10月17日，厦门解放才结束了这项任务。11月初，我们就回到福州。

我们驻扎在仓前山塘池村，经过为期3个月学习整风后，应福州市委需要，到仓山区高湖、白湖、浦下一带当农村工作队，组织农会进行减租反霸工作。根据形势发展，福建省委农委需要部队支持在闽侯七区徐家村、甘蔗镇的农村工作队，于是民运部又成立了一个全副武装工作队，加入省农会土改工作队。我被抽调到第二工作队，在桐口、永丰工作。闽侯县老七区有两个关口常有土匪出没抢劫：一个是昙石村，两面都是山，从上海运来的军用物资和民用物资，经常在那里公路上遭到土匪抢劫；另一个是现在的永丰乡，离洪山桥不远叫文山里的小村，一边是山，一边是闽江，也是土匪的抢劫要地。第二工作队被分成两个部分，分别驻扎永丰乡和昙石村。我们工作队与地方的农会土改队一起工作。那年端午节前后还发生了一场洪灾，整个福州都被淹了。有的地方水淹到七尺多深。我们在农村就先救灾，在救灾的基础上打土匪、进行“三夏”工作。

当时土匪骚扰不断。土匪老窝在闽侯桐口乡



东北附近山上一个叫奶奶坪的地方。福州军管会下决心消灭这股顽匪，就调两个加强排的解放军带着轻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等，悄悄地深夜奔赴奶奶坪，我们的工作队在桐口乡的桃田村接应。

桃田村离奶奶坪较近，为防止土匪逃窜进村，让我们在桃田村一个路口的草丛中蹲守。时值炎夏，到处有蚊虫叮咬，我们一动也不能动，眼盯着奶奶坪的方向。夜半就从远处传来枪声和火光。

等到天亮，我们就看到解放军扛着红旗走来了，就把他们迎到桃田村。据大军说土匪窝已经被捣毁，土匪死的死，伤的伤，还有一个因为外出找食没被抓到。后来经过审讯伤匪，我们找到漏网土匪的老家把他缉拿归案。消灭了土匪，才能安全进行土改。

我那时候21岁。那里的土改结束后，已是1949年年底，部队整编，很多人要下放到地方工作。当然民运工作队也要改制，我们只好依依难舍地脱下军装，穿上了干部服。

闽侯七区土改顺利结束，工作队又抽调一部分人到闽侯大湖（老九区）进行土改。我曾参加四个乡的土改工作，从元旦开始一直到五一节，

才回到福建省农委会。这是中共福建省委下面的一个工委会。我从部队转到地方就直属福建省委管辖。

二

刚解放的时候，福州所有大学都由福州军管会统一接管，1950年底，归省委宣传部管。1952年初，教育部决定把厦门大学农学院并入福州大学农学院，统称为福建农学院，学校设在位于马尾魁岐的福建协和大学旧址。原学院院长是著名教授李来荣。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在学校叫做“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省委宣传部为此成立高校总学习委员会，需要抽调一些干部来参加工作。农委会的组织部部长翻到我的简历，看到我是学农的，就让我跟其他几个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同志调到农学院当工作队。因院系需要成立了几个不同的学习小组，有农艺、园艺、病虫害、林学、综合科等小组。我被分在病虫害林业综合小组，担任学习小组长。

学习委员会就设在原来协和大学的校长楼。因为美国人校长在1950年底就走了，校长楼已闲置了一段日子。学委会的领导人是省农委派过来

的李力秘书长（后调任南京农学院党委书记）。

今天看来校长楼外结构都没有变。在校长楼两侧下方又有两座楼，供教务长、总务长分别居住。解放后，右面楼下住着教务长卢浩然，楼上住着派去的老干部杨浩林；左边住着总务长李耀福和一位老教授。杨浩林是李力同志调走后，上级于1952年下半年派来接替他的工作。杨浩林原是宁德市的宣传部长，调来当政治处主任。后升为副校长，再后来成为党委书记。他在农学院的时间最久，在教育界很有名，还当过省文委会主任。

从1952年到1957年，我很幸运一直住在校长楼里，跟农学院的另一位教授、后来的农经系主任王振邦住在同一房间。我们的床铺各靠一边墙壁摆放。因为原先是教会学校，校长楼下还有礼拜堂和圣经讲堂，原先还有几架钢琴，后来分配到其他大学了。每个房间都有壁炉，密封的，有烟囱排气。这里的冬天很冷，壁炉在冬天的时候烧柴供美国人取暖。炉底下面是石板，石板上有一个铁制的铺垫，很可惜，在后来大炼钢铁的时候，里面的铁件全部被撬掉了。每个房间的门上原来配有高级的铜锁，可以反锁，在大炼钢铁的时候也被拆走了，仅剩下圆形的锁孔留在门上。较大的房间中间原先是隔开的，学委会的女同志住在另一边。窗外的松鼠经常会从窗户跳进来，可见这个地方人与自然多么和谐。楼后面原来有两座水塔，是鼓山喝水岩的水直接引过来的，后来，水塔在修建铁路隧道的时候也被炸掉了。

我们早上起床也不要闹钟，就走到露台上活动。露台原先设计的时候就有点斜度，这么多年了，地面都没有裂掉。窗户木框上边的左右边角原先是直角型的，没有今天这样弯角的造型。

从窗户可以看到不远处澄水如练的闽江。闽江对面是林浦村，现在已经大变样了，当时附近没有高楼大厦，放眼望去尽是低矮的茅草屋。夏天水涨的时候，我还到闽江游泳。过去这里的交通就是依靠江边的码头，不管汽船还是民船经过那里都会停泊。每到星期六，家在福州的教授就

会坐上小船，从台江上岸回家。1954年后才开通到福州的公交车。

最可惜的是校长楼下面的一片竹林，现在都不见了。从山下通往校长楼的路上原先还有一大片松树林。松林和校长楼下的竹林是当时很有名的景色，大家都说“明月松间照，竹林风萧萧”。农学院原先的生态环境、自然风光特别好，许多住在这里的教授都长寿，好几位都超过100岁，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与极好的空气和自然亲近。后来生态被破坏得很厉害，这些美景都不见了。

我记得那时校长楼下有一株很大的桑树。还有一株番木瓜长得非常茂盛，结了好多好大的木瓜。那时的教授经常带着学生实习，到这里来指给他们看，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那个植物叫什么名字。我还记得桑树的拉丁文名字叫“莫拉给扎”。

离校长楼最近的那条路旁种着很多法国梧桐，后来也全部被砍掉了。那些法国梧桐上面有一种蝉，是很少见的红色知了，现在也没有了。

从男生宿舍光华楼、光国楼通往理学院的路上也有很多树，还有白桉树。白桉树的叶子是考拉的食物，但对人体有害。还有不少非常漂亮的高大松树，现在很多都没了。走在那条路上可以更近地看到闽江，看到闽江另一边的林浦。闽江上帆影点点，汽笛长鸣，在这个地方，你不但可以静心读书，而且可以尽情享受环境的幽美。

当时这里还有一个农场，一个叫做张利镡的蔬菜改良专家在其中搞品种实验。农场里盛产蔬果，果树主要是柑橘，花菜更是农学院有名的品牌，经老张育种的花菜、包菜种子行销省内外。

1958年这里修铁路，学校搬迁，很多老教授知道以后都依依不舍。

三

1952年到这里以后，我被分配政治处，负责宣传工作。原协和大学两栋很大的楼，一名“文

科学院”楼，一名“理科学院”楼，我当时的办公室就在理科大楼里。1952年年底，领导让我担任党史课（时叫“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教学。上课在理学院一间很大的百人阶梯教室。当时党史是必修课。我没上过大学，但是我在大学讲坛上为大学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至今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学生，都还记得给他们讲课的汪老师。不知道现在里面怎么样了，外面附在建筑上的东西都是后来加的，破坏了原来的样子。党史是重点课程，记得52届学生毕业时必须通过党史课的口试。我负责口试的出题、主问和评分，最后由坐在旁边的教授们讨论决定是否通过。

当时的领导层经过院系调整是这样的：院长李来荣，副院长黄农，教务长卢浩然，周可涌和赵修复都是系主任。李来荣、卢浩然、周可涌、赵修复，这四位著名的教授那时被称为学校的“四大金刚”。

说起李来荣，真是值得尊敬的老科学家。他在果树、热带作物方面很有成就。当年李来荣到美国留学、进修博士，归国途中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船被日本人掠到新西兰，被监禁了好多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李来荣才回到国内。

黄农是从福建省立农学院过来的，后来做过林业厅厅长，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又回到学校当教授。

当时在这里的学生只有三百多人，不像现在一个学校几万名学生，老师上完课就走，跟学生基本不认识。当时的老师跟每一个学生都认识并且熟悉，学生跟老师的关系也都很好。那时候的学生很艰苦也很纯朴，莆田的学生特别能吃苦。放寒假的时候，不少莆田来的学生从学校回家，从闽江过渡到林浦，然后把鞋子一脱，就打赤脚走回去。有很多学生是到了农学院以后才第一次穿上鞋子，穿上鞋子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说，我们农家人在家里哪有穿鞋子呀？

在学校入口处有个大食堂。刚解放的头几年，老师和学生通通都在大食堂吃饭。学生伙食费一个月8元钱，由公家负担。教授因为有工

资，吃饭的钱就自己出。那时候伙食不分高低，大家吃的是一样的。后来在理学院楼下的一个房间建了个厨房，教授们的伙食就提高了。1956年进行工资改革，我月工资30多元，伙食费一个月12元。后来食堂搬到女生宿舍后面的红楼下面，伙食的档次就分得更细了：有一个月18元的，有一个月12元的。18元一个月的伙食相当好，我也试吃过一个月。

我在这里授课一直到1958年。

1958年以后，我工作调整，和农学院一起搬到福州西郊梅峰去了。从1958年到1963年，我在院刊室负责《福建农学院报》的编审。

后来，因为那时候我爱人在闽侯县中学教书。1963年，我也调到那里去了。我在位于闽侯南屿镇的闽侯第三中学当教导主任，之后在闽侯第二中学、闽侯教师进修学校任教，还当过校长。

1958年，农学院从魁岐搬到梅峰，文革期间又搬到三明沙县，文革以后在三明荆东沙县复校。后来发现学院放在那边不行，因为高校的生存发展与文、理各学科以及财政各方面都有紧密关联，单独弄一个农学院在三明，没有办法发展。省里的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还有福建医学院也都经历过下放。农学院之所以还能选取在金山建校，经历了很多曲折的斗争。

农学院从三明搬回来了，但教工子女的上学成了大问题。让孩子们到福州市区去上学非常不方便，所以很多教职工要求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杨浩林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校内办了农林大学附中，一开始工作铺展不开，就把我从闽侯调回来建校，我就又回到农学院了。用了三年的时间，农林大学附中的中考成绩就在福州一般校中位列第一。现在这所中学又被取消了。

我从河南到福建，再从部队转到农学院，在福建协和大学旧址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参与、保留了与学校的一段回忆。我今年90多岁了，从进入福建农学院到今天70年过去了。往事不堪回首，但不记下来就都湮没了。

福州地区名人祠庙祭祀 与福州人的精神

◇杨济亮

汉代闽越人就“信巫鬼、重淫祠”，迄至唐宋，闽人仍保持这种习俗。唐刘禹锡论福建：“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宋代，《仙溪志》作者承认：“闽俗机鬼，故邑多丛祠。”唐宋时期，福州出现了不少医药神和女神，如临水夫人、白真人等。明黄仲昭《八闽通志·祠庙》载，明代之前，福州府属各县的祠庙有113座，其中唐末以前的祠庙仅9座，唐末宋元时期建造的祠庙75座，增长了8倍多。明清时期，这些祠庙都延续下来，有的还流传至今。福州城乡常见各种祠庙，祭祀的对象除早期的巫道人物外，还包括闽地开基祖先、反侵略的英雄、名宦良臣、硕儒名士、行业能手以及为民谋福的平民百姓等，体现了福州人崇文重教、崇尚英雄贤能、不忘本源、感恩知报的性格和精神。

纪念开基建国和族群的祖先

闽地土著百姓在唐中叶获准恢复祭祀闽越王。闽越王无诸即是开基肇建闽越国的君主，更是闽越族的祖宗神明。流传到今的的闽越王庙分布在闽侯县洋里和荆溪永丰、上街镇，闽清县坂东和下祝，仓山区港头等处。白马王祖庙在今晋安区鳝

溪，传说闽越王郢的第三子“白马三郎”，在鳝溪用箭射杀了兴风作浪的蛟龙并与之一起殒命，后人便在此建庙祭祀他。福州的白马王庙民间多称为汉藩府某某堂，其他各县乡河边路口也多有此庙。

福州鼓楼区庆城路闽王祠主祀五代开闽王王审知。闽王祠址本是王审知故居，现构主体为明代建筑。王审知从河南率部入闽，建立的闽国，发展教育和商贸，保境安民，加速了福建地区的汉化。福州鼓山涌泉寺，仓山下藤路、上渡，北园王氏宗祠，城门安头也都有纪念闽王的祠堂。古田刘公祠是纪念畬族的开基祖先、峒豪刘疆



闽王祠

的。刘疆天性仁厚，乐善好施，品德高尚，深受“峒人”拥戴。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刘疆与林溢、林浞兄弟等率众献土归唐，开元二十九年编户为县，玄宗皇帝“嘉其忠顺”，赐名疆，封为古田首任县令。刘疆歿后，乡民感念其率众垦荒，创邑有功，勤政为民之功德，以其故居立庙，号“宁境”，尊为“拓主”，大学士张以宁于元惠宗至元三年为城隍庙撰《古田增广城隍庙记》。

崇尚反抗侵略、为国捐躯的英雄

北宋的李纲是抗金名臣，被宋帝两次起用。李纲是邵武人，晚年曾寓居福州仓山天宁寺、东门东报国院、长乐天王寺祠，死后葬于闽侯荆溪光明村大嘉山，后福州人在西湖桂斋、仓山葛屿建李忠定公祠以纪念之。同样积极主张抗金的还有太学生领袖陈东，被仓山台屿村陈氏家族奉为忠烈，建祠祭祀，甚至还传播到东南亚华侨社区。

仓山潘墩球山的文天祥庙是福州地区仅有的文天祥庙，是文天祥的战友兼金兰潘龙的玄孙潘中宪上奏朝廷而立的。祠庙正中立有高大的文天祥彩色塑像，殿堂正上方还有一块写有《正气歌》的牌匾。潘墩村每年有三次迎神绕境、行香祈福和公祭文天祥及文家军为国捐躯的将士的活动。每逢文天祥的生日，潘墩村人会争着第一个去祭拜，斟上福建老酒，再燃起一炷香，向着文天祥塑像深深一鞠躬，高声道：“文大王，生日好！潘龙后人给你祝寿了！”从1380年文天祥庙始建以来，潘墩村村民年年如此，代代相传，且在继承的同时加以丰富和完善。顽强地延续和体现了福州人民的英雄记忆。

杨梦斗和高应松是长乐两位因抗元而同年牺牲的忠义贤臣。1276年，杨梦斗在抗元斗争中在扬子江凿舟自沉，壮烈殉国。同年，高应松在临安（今杭州）被俘，绝食不语七日，殉国。后里人建祠祭祀两位忠臣。高应松祠堂现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除了长乐玉田镇东渡村外，福州北门灰炉头也有一座杨公祠。长乐南阳的三忠祠是

纪念宋末爱国义士陈公荣及其子宗傅、侄老成并同时勤王殉难的陈氏族人173人的专祠。闽侯南通的瓜山村民从清代开始，每60年一届，普渡南宋末年在瓜山血战牺牲的抗元英烈，至今已办了六届。

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永泰嵩口的德星楼供祀“林公大使”。林公指的是宋末抗元的林氏三兄弟中的林惠公。林惠与其兄林显、其弟林应共同响应文天祥的号召，组织民军与元兵作战，但兵微将寡，粮草不济，力竭不支，被元军杀害于大樟溪畔，扔入溪中。大樟溪两岸民众不忍心英雄死而葬身于鱼腹，就沿着两岸寻找英雄的尸体。后来，嵩口民众找到林惠的尸身，埔垵村的民众找到林显的头颅，就分别建了一座楼用于祭祀英雄。嵩口的叫“得身”楼，埔垵村的叫“得首”楼，久之，又以方言谐音被改为“德星楼”、“德首楼”。三兄弟里的小弟林应公，后来转战南海，在崖山海战中牺牲。

福州人民同样不会忘了抗倭英雄。最著名的当属明代抗倭名将张经了。张经，号半洲，洪塘人。因在浙江前线被监军诬告而下狱被杀，成为千古奇冤。家乡人没有忘记他，旧时，台江苍霞洲有座七省经略庙，在洪塘建的西坛忠烈祠至今犹存。而由张经生前推荐的新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在宁德横屿、福清牛田（今龙田镇）、莆田林墩等地痛击倭寇，取得大捷，还在于山大宴将士庆功，福建副使汪道昆勒有纪功碑铭，后人在于山题刻“醉石”，以纪念此次盛事。同时，于山、乌山（重建于1918年）、福清、连江透堡等地都建有戚公祠或保民堂纪念戚继光。乌山山边巷曾建有戚俞二公祠，纪念戚继光和俞大猷。

此外，长乐梅花镇有座纪念护国佑民的抗倭英雄林位的祠庙，号“林位宫”，至今香火旺盛。而福清海口镇各村村民近500年来则保持不变传统：在清明时节要先到镇东卫城抗倭英雄义冢祭祀当年血战倭寇，将生命永远留在这里的无名烈士，然后再祭先人。

明代抗清英雄钱肃乐本是浙江四明人。明崇



林则徐祠

祯十年（1637）进士，曾在浙闽募兵勤王，襄助鲁王。明亡，绝食卒于舟，安葬于福清黄檗山。钱肃乐虽没有文集传世，但在长乐晦翁岩、鳌峰岩诸处，多有题吟。清光绪年间，乡人在潭头泽里鳌峰岩左面增修一座钱公祠，纪念钱肃乐，至今香火旺盛。

近代，左海伟人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坚决抗英，成就了中华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林氏后裔及门人集资兴建了林文忠公祠，成为今天福州人民纪念林则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圣地。昭忠祠建得更早——清光绪十一年（1885），是祭祀中法马江海战中牺牲的中国将士英灵的场所。1884年8月23日，法国侵华舰队闯入马尾军港，对停泊的福建水师舰队发动袭击。福建水师和两岸官兵愤起反击，浴血奋战。马江海战后，还建有另一座昭忠祠，在长门炮台，入祀者有4773人之多，现祠已无存，只留下《捐建长门昭忠祠暨张刚勇公专祠碑记》等二碑。

崇尚儒家文化精英、隐逸名士

原建在驿里南侧（今通湖路馆驿桥附近）的拙斋祠，是纪念闽中儒学先驱林之奇的。林之奇的老师吕本中之侄“小东莱”吕祖谦曾入闽师从林之奇，当时林之奇门下弟子达数百人。朱熹最有成就的门人也是女婿黄榦，最早所受的理学启

蒙教育也来自林之奇。

位于则徐小学附近的道南祠，始建于宋宝祐六年，明成化元年重建，清乾隆后毁。它是为朱熹师祖、“程门立雪”的主人公之一杨时先生所立的。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当时在家乡河南颍川送别他的得意门徒杨时、游酢学成南归福建时说：“吾道南矣！”意思是，我的理学造诣和成果从此可以向南方传播了！而后武夷山被称为道南理窟。闽侯尚干杨厝村的龟山阁是纪念杨时而立的，由杨姓族人重建于明崇祯年间。南宋福州乌山曾建有“海滨四先生祠”，

在乌山的宿猿洞（原省气象台内）建有湛公祠。前者指的是不求仕达，仁德立身的闽学先驱“海滨四先生”——陈襄、周希孟、陈烈、郑穆，后者指宋郎中湛俞，都是淡泊名利的名士。单祀陈襄的古灵祠旧在万岁巷（即庙巷），后移象山南麓。另外，闽侯南通也建有古灵祠，故乡百姓俗称“皇帝先生”的陈襄故居历经风霜已成废墟。清乾隆十一年（1746），福清籍南安知府游绍安在乌石山般若台旁倡建游先生祠，祭祀的是“程门立雪”的另一主角、北宋建阳理学家游酢。乌山上还曾建有纪念福建省九位著名学者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李侗、朱熹、蔡沈、黄榦、真德秀的九贤祠、宋代五先生祠（周希孟、陈襄、陈烈、郑穆、刘彝）和许公祠（祭宋状元许将、宋郡守叶棣建凤池坊，并名其乡为凤池东西乡）。

朱紫坊内前几年还保留着一座北山先生祠，紧临董见龙先生祠。北山先生陈孔硕不仅是“芙蓉园”的老主人，而且也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去世后，人们在府学里建祠祀之。北山先生祠碑今仍存于山大士殿内。

北有孔子、南有朱熹。福州十邑几乎凡有书院的地方都建有朱子祠，如中山路贡院文笔书院、林浦村濂江书院、亭江龙津书院、琅岐竹浦罗峰书院等在在皆有；还有诸如乌山、鼓山、鹤林、东门竹屿、仓山小岭、台江紫阳村、连江丹

阳镇、贵安朱步村、敖江上山村、廖沿朱公村、长乐县城奎桥、三溪村、洋屿云门寺、潭头二刘等传说朱熹过化之地都有纪念朱熹大儒的祠庙亭台。做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系统整理了理学理论为“理一元论”，被后学称为“朱子理学”。朱熹身体力行，积极从事理学的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他至少十次过境福州，并和他的学生在福州地区办过11所以上书院。

朱熹的弟子兼女婿黄榦也是个大儒。黄榦曾任安徽安庆知府，主持修固城池，后来金人破黄州沙窝诸关，“独安庆安堵如故”，被当地百姓称为“生父”。黄榦在外任职之时，朱熹有一次上门看望自己的女儿朱兑。黄家贫困，拿不出大鱼大肉招待，只能准备葱汤麦饭招待老父。朱熹写下了“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黄榦是传播和推广朱子学的第一人，初传朱子学大都出于黄榦之门。现在鳌峰坊的勉斋精舍，是其门人赵师恕因其故宅所拓建，后为书院和祠堂；晋安北峰的高峰书院也有黄勉斋先生祠。在黄榦的家乡——长乐古槐的黄勉斋特祠是清康熙年间乡人将其旧宅改建的，祠堂内还有康熙赠黄榦的御书“道统斯托”与蒋介石书赠黄榦后裔黄钟瑛的“砥柱中流”等。

鼓楼区井大路龙山巷的樟隐祝先生祠祭祀的是祝穆，可惜前几年开元寺扩建观音阁时被拆掉了。祝穆是朱熹的内表侄、号樟隐，其著作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最著者是《方輿胜览》。他系统整理出版了朱熹的理学论述，予以注释、出版，传承朱子学说甚为得力。长乐首占有合祀朱子、黄榦、陈栎、刘砥、刘砥的五贤祠，此外，二刘村龙峰书院有三贤祠，乌山西南坡、鳌峰书院和闽侯荆溪凤山书院等处都曾建有六子祠，供祀宋先儒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六人。

宋代东门竹屿村建有东野竹林书院，理学家朱熹在此讲学。邓原岳把竹林书院遗址改建为

“竹林精舍”，邀集著名学者谢肇淛、曹学佺、林宏衍、陈荐夫、徐燧、徐燊在此结社吟咏，人称“竹林后七贤”。后扩建恢复为“东野竹林书院”。院左为“竹林草堂”。后人将原有的竹林精舍改称为“七贤祠”。又辟地建“乡贤邓公祠”。祠旁有一口宋代古井，祠中楹联匾额颇多，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荡然无存。鼓山五贤祠祀徐燧、谢肇淛、林宏衍、徐燊、曹学佺等五人，是清末盐商兼学者魏杰所构。

永泰三元祠，是清道光十一年（1831）为纪念南宋乾道（1166-1172）年间该县七年连中三状元（萧国梁、郑侨、黄定），与联奎塔同时兴建的，彰显了这一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的科举盛事。长乐鹤上镇沙京上李村莲峰李氏特祠，俗称李骐状元祠。李骐自幼聪慧异常，十岁即通读《孝经》《论语》，洞悉其义。永乐十五年（1417）福建乡试第一，解元。次年会试第一，会元，廷试又第一，状元，于是“授翰林修撰，赐银带朝服，中外以为荣”。且为明代科举福建省“三元及第”唯一人。李骐重皇恩、讲孝道，耿介，有气节，当朝大学士杨荣惋其不寿，撰墓志建特祠祀之，祠称“李氏特祠”。



永泰三元祠

西湖开化屿的宛在堂平常很少开放，它是明清开始祭祀福建省特别是福州270位知名诗人的建筑物，是全国唯一的集中祭祀诗魂的文化圣地。最早是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诗人傅

汝舟计划营建，以诗名“孤山宛在水中央”为堂名，招诗友高澍等同来隐居。但直到清乾隆年间，才由十砚轩主人黄任倡议，将湖心亭改建为小楼，正式命名为“宛在堂”，并设立诗龛，入祀历代闽籍著名诗人。

崇尚为民牺牲的忠义刚烈先贤、革命志士

刚显祠，在乌山邻霄台侧，旧为三贤祠，祀唐吴兴处士周朴。周朴在唐咸通年间避战乱于乌山，与神光寺僧灵观、侯官令薛逢友善。唐乾符五年（878），黄巢攻陷福州，欲任用他为官。周朴谢曰：“我为处士，尚不屈天子，安能从贼”？于是被黄巢所杀。朴为诗极雕琢，字斟句酌，盈月方得一联一句。闽人即其地立三贤祠祀之。宋绍兴初，张浚帅闽，疏于朝，赐号刚显。明季庙圯。

伸蒙祠祭祀唐儒林慎思，有两个地方，一在长乐德成岩、一在乌山北麓。林慎思和周朴一样，是又一个惨遭屠戮的文化精英。史载：林慎思号伸蒙子，钦平里（潭头镇溪新村坑湖里）人。年少好学，兄弟五人在筹岩筑室读书。唐咸通五年（864）荐礼部试，不第。退居梓里（在长安），著《伸蒙子》《续孟子》。咸通十年中进士。翌年再试，中宏词科第一。兄弟五人先后俱登第。懿宗赐“兰桂同芳”匾。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今西安），林慎思领兵出战，力不支，欲自刭，遂被执，逼降，慎思踞床骂巢，被割舌处死。

罗山曾公祠位于山北麓法海路（罗山）的花园巷内。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狱神名曾扬立，湖南人，时任闽县典狱长，因所释犯人超期未返而自杀殉职。乡民深为曾公事迹所感动，便建祠以资纪念。

民国4年（1915）民国政府将耿王庄绘春园正式辟为公园，后来根据林森先生提议，在园内建造“忠烈祠”，以纪念辛亥革命闽籍烈士。抗战期间，南公园遭到严重破坏，“忠烈祠”也被毁。黄花岗起义闽籍七十二烈士中福州籍的有23位，他们为了推翻帝制，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

命。烈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永远值得福州人民缅怀和纪念。

崇尚忠君爱国、反分裂的正统人士

乌山清尘岩的范公祠是清康熙皇帝赐建的。康熙十三年（1674），清廷以明朝汉族反抗力量基本消灭，乃削除三藩，靖南王耿精忠等“三藩”于是决意起兵反清，擒杀满清闽浙总督范承谟。后耿精忠与郑经不睦，又再降清。康熙十八年清朝于乌石山南麓修建范公祠。康熙廿一年，康熙将耿精忠车磔于市，同年赐范公祠碑文。此残碑今还在有关文管部门。

乌山上曾建有祭祀为收复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施琅大将军的施靖海侯祠。施琅（1621-1696），原名郎，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初为郑芝龙部将，顺治初降清，康熙元年官水师提督，三年加靖海将军，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兵攻克澎湖，八月统兵攻灭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封靖海侯，著有《靖海纪事》。在乌石山邻霄台侧原有一段记载金镇等人随从大将军施琅收复台湾的摩崖石刻，其文楷书，字径3寸。刻文：“辰韩金镇定一、凤凰山安尔玺琮侯奉天子命，从大将军克平闽海，功成班师行有日矣，重九登邻霄台联吟纪胜。”“大将军”即指施琅。

王壮愍公祠位于乌山石林景区北侧、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原位于福建省电视台内，所以大多市民无从知晓。王有龄（1810-1861），字英九，号雪轩，侯官县人，云南丽江太守王燮之子，官至浙江巡抚。1861年，太平军进攻苏杭，王有龄困守孤城，自缢而亡，被清廷追赠光禄大夫，谥壮愍。

螺洲镇孔庙旁有座“护国显应三刘尊王祠”，是祭祀主动让贤、有功五代闽国王氏的功臣刘行全和刘德全、刘侍全兄弟三人的。最早是王审知向中原朝廷奏封而立的祠庙。仓山吴山村耕藏祠奉祀控鹤林延皓。拱宸控鹤都使林延皓（870-936）也是在唐末随王审知入闽，曾为王氏政权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后定居吴山，成为控鹤林

姓入闽始祖。

纪念造福一方的贤臣名宦

现位于鼓山前屿村的阮公祠祀南朝太守阮弥之，清陈衍《福建通志·名宦》记载：“昌国初为蛮地，俗不知学。弥之教之稼穡，兴学校。家有诗书，市无斗器。”昌国指的是昌国郡，即后来的晋安郡（今福州）。该祠最早在乌山南麓，称“七闽人师庙”。明万历七年（1579）祠毁，遂移迁于东水关外归善里钱屿墩（今前屿）。常公祠祀常袞，常袞是中唐时期丞相，后入闽为福建观察使，是推动福建教育开化的能臣。明代福州府学重修了常公祠，今重修常公祠记碑仍立于山碑廊。常袞之墓在永泰县葛岭中学，在文革中已毁。

卓公祠，祀卓佑之。明《八闽通志》载：“卓祐之，字长吉，闽县人，居文儒坊。景祐元年（1034）进士，历秀州（治今浙江嘉兴）推官。生而正直，自谓死当为神。”后因任满，“挈眷归闽，举家没于溪滩”。明隆庆元年（1567），陈元珂撰《重修闽山庙记》记载，卓祐之“既歿，频著灵异，后人即所居祀之，所谓应公大夫是已”。今人是纪念他为官正直公平，死于水难，才祀为神。

上街梁国公张睦祠、樵货大王庙。据《十国春秋》载：“张睦，光洲固始人，唐末从太祖（闽王王审知）入闽。太祖封琅琊王，授睦三品官，领樵货务。睦抗攘之际，雍容下士，招来蛮裔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后睦卒，以薛文杰代领其事，多察民间阴事，致富人以罪，籍没其资，竭取予民，国人怨苦，思睦之德政，为纪念他的富国裕民，勤政廉明之功德，在福州仙塔街凤池坊建樵货庙纪念他。

包拯是中国古代清官人物的重要代表，包公庙在福州并不多见。主要分布在仓前佛寺巷、高湖村、潘墩村、湖际村等处。高湖村包公庙历经多次重修，现存建筑为清光绪八年（1882）重修。

乌山上曾建有瓣香堂，是祭祀宋代知州、唐

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长乐首占有合祀宋代的陈宋霖、陈枏、陈合这三位乡贤。仓山下藤路有个蔡氏宗祠，之前本是蔡忠惠公祠。蔡襄第一次到福州任职，不久便遇上了大旱，粮食歉收，群众生活困难。蔡襄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发动百姓群策群力，自筹资金，在东湖地恢复五塘，解决了1000多顷农田灌溉问题，保证了旱涝保收。受益的8000多户群众无不高兴万分，自发在五塘旁边为蔡襄修建了一座生祠，以纪念蔡襄的功绩。

连江县东湖乡的鞠刘祠祭祀为民修水利的鞠仲谋和刘逵，刘逵是唐咸通初年的连江县宰，任上修复隋代开凿的东塘湖。鞠仲谋，字有开，密州高密人（今山东高密），著名宋朝大臣。他在任时又在连江东湖架设桥梁，更换腐朽的木斗门为石斗门，还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为后世所称道。

闽侯南通宋少保方公祠祀方真。宋嘉祐七年（1062），方真御封光禄大夫，所居坊赐名为“光禄”。南屿江口宋公祠，祭祀宋璟，原座落于福州鼓楼区中山路8号。因国家用地，福州市鼓楼区文化局、文物管委会办公室发文保护并提出易地修复建议。晋安区横屿的柳公遗爱祠不知何许人，也称宏山古迹、象山大庙。现主祀白马尊王。其中大殿一石柱刻有“前宋乾道六年庚寅岁八月十三日经始”，可知大庙始建于南宋时期；另一侧石柱刻有“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八月十二日翻盖”，可知元代进行了翻建。此外，殿内还留有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多幅楹联。

西湖大梦山一带历史上建有庞商二公生祠（分另是商为正、庞尚鹏）。商为正巡按福建，协助巡抚庞尚鹏推行“一条鞭”法，巨室弗悦，百姓称便。民歌有云：“庞公父，商公母，增我田畴省门户，隶不下乡，民不见官府。”福州兴化皆立祠祀。行满回京，父老跪送者千余。此外，还有江公生祠（祀江铎）、殷庞二公祠（祀殷从俭、庞尚鹏）。鼓楼朱紫坊府学里有个一米多宽的小巷里有座董见龙先生祠。董见龙，名应举，字崇相，连江琯头人，是明万历年间进士，



戚公祠

天启年间官至工部侍郎兼户部侍郎。福州坊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故事。有资料记载，董应举在福州任职期间，在乌山建太虚亭，还为疏通、美化福州内湖、内河等做了许多工作，他还热衷于公益事业，受到老百姓尊敬。在连江青芝山上也有一座董公祠。于山报功祠祭祀马森、崇报祠祭祀林廷玉。

仓前安澜会馆旁孙文靖公祠。孙尔准是清中期大臣，为官清正，关心民生疾苦，他在闽任闽浙总督前后长达10年，有相当政绩，对闽台科举教育作了不少贡献。他熟悉福建的风土人情，受闽人爱戴。清同治五年（1867），浙江人为纪念孙尔准，建祠立碑。碑宽为1.08米、高3.40米、厚0.27米，该碑现置孙文靖公祠（现存万科公司），碑额浮雕双龙纹并刻篆体“锡羨岩疆”四字。碑身直刻16行真书碑文。

龙津境左公祠正在复建之中，马尾的左沈二公祠前两年修复开放。左沈二公祠位于马尾旺岐澳口对岸，建祠至今已有95年历史。前人曾留下许多珍贵文物，但因为种种原因，该祠于1956年被毁。为缅怀左宗棠、沈葆楨创办船政的伟大功绩，2013年，马尾区重建了左沈二公祠。而原在乌石山南麓的沈文肃公祠是其逝后9年即清光绪十三年（1887），奉旨修建的。如今，祠堂早已被包入市政府大院，只留下一座五开间变为了办公场所。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东街皇华馆卒，乡人于龙津街大王庙附近（原南公园正门口）建“左公祠”纪念他。抗日战争时期，南公园及周

边遭日军严重破坏。1949年以后，左公祠曾一度被用作木雕厂的厂址，现在市政府正着手重建。

纪念为民请命造福的平民百姓 和行业能工巧匠

长乐林长者祠，是为纪念唐代捐田开辟闽湖以溉民田的林鷗；清道光间邑人何则贤在乌石山建“先薯祠”，祭祀明万历年间从吕宋（今菲律宾）引种和推广番薯的长乐鹤上华侨陈振龙和福建巡抚金学曾。今祠已毁，政府在乌石山石林景区灵岩上建亭以代替。

福州地区祭祀拿公的庙宇传自闽北邵武的拿口，但在传播过程中，福州人民通过一个传说让神明本地化了。林枫《榕城考古略》记载，汤和率领的部队抵达闽江五虎门时，先派遣使者入城招安，结果遭元兵杀害。汤和大怒，大张号令，云：“入闽不留一人。”但是，闽江口五虎门地形险要，礁石遍布，船只入港必须导航。这时“拿公”响应为之指引。在《竹叶亭杂记》里还有一段记载——拿公乘巨浪驾小舟出现，到汤和将军营中说：“君号令中，今易一字，吾导他港以进。”汤和答应，于是便引导由粗芦门入。同时对汤和说：“吾顺命导公，欲安福州百姓，今已入关，以“留”字易“杀”之。”汤和答应，便将原来的号令“入闽不留一人”改为“入闽不杀一人”。汤和部队顺利通过五虎门沿闽江抵南台，部队由洪武道登岸，在南门一带战败元军，攻取福州。为了纪念拿公，建了拿公庙，旧在大庙前三保街的拿公楼、每年五月十六要举行祭祀和巡游。现存的拿公庙有台江河下街的卜公祠、北门外新店官路旁和竹屿村的竹林境拿公庙（已异地搬迁）。

位于台江南禅山西麓山边街小巷里的鲁贤祠（即南禅山鲁班庙）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为三进式砖木结构，现存两进，基本保存下来，现正在修复。其实，晚清乌山南麓也曾有座鲁贤祠。

考辨福州方言之古汉语“化石”（一）

◇施文铃

福州佬依垵【求山切8】蜀堆有讲，蜀掰喙堕【求装切8】落出速【柳伊切5】读若梨都是古汉语化石。（福州老人在一起聊天，一张嘴滑出来都是古汉语化石。）福州话和普通话同源于古汉语，只是支派不同，普通话为历朝历代官话汉语正源传承，福州话属于弱势的方言，在民间代代口口相传，有的可能已经传承几千年不变的口语，福州话里遗存许许多多古语古音，不少字词起源可以追溯到秦汉之前的古汉语。

许多古汉字在现代汉语中不见了，普通话的语法、字词经历不同时代演变，发生很多变化，古语古音在普通话中很难听得到。但是，这些古老的汉语在老福州人现实生活中活灵活现，不妨举一些例子，辨证福州方言是古汉语的活化石。

古考福州方言“齧”字

而今，古汉语依然活在老福州人嘴中，如“齧【语钗切2】蛀【曾优切3】读若照”（蛀牙）；“齧疼”（牙痛）；“取齧”（拔牙）等等。福州话的“齧”，是“牙【莺嘉切5】”和“齿”的统称。辨析福州方言“齧”字，必要先对牙和齿二字做一番古考。上古汉语“牙”与“齿”有别，牙是牙齿是齿，据唐人颜师古对西汉史游《急就篇》注疏曰：“齿者总谓口中之骨，主齧啮者也。”说明在西汉之前的牙齿通称“齿”，不称作“牙”。至今这个“齿”的称谓在福清方言得以印证，福清话称牙齿就是讲“齿”，如“齿锅”（牙罐）；齿刷（牙刷）等等。古人用“没齿难忘”来形容一辈子不忘，这

里的齿指牙齿。再看看“牙”字，在前秦时期牙字初始字义指兽牙，见《易·大畜》注解：牙，豮豕之牙。成语有“狗嘴吐不出象牙、毗牙咧嘴、虎口拔牙”等等，牙字的本义指兽牙。从东汉许慎编纂字书辨析，《说文解字》牙，牡齿也。齿，口断骨也。可见汉朝《说文解字》对“牙”字义做了调整，由前秦的兽“牙”，引申到人的齿上，把牡齿谓之牙，即犬牙，又称虎牙。事物总是应客观需求而发展，汉语发展过程有过引申字义用法，打破“古汉字一字一义”的法则。如，《后汉书·华佗传》云：“齿牙完坚”。这句话说：“齿和牙完整而结实”，这时期嘴中的“齿”分别出来“牙”。后来以咬嚼食物功能的“齿”称为“牙”，福州话谓之“大牙”，见《汉语大字典》牙，指大牙。而用以切剪食物功能的仍称“齿”，福州话不称“齿”，谓之“脸前齧”。由“咬牙切齿”这一成语，足以说明牙齿以不同功能有不同名称。此后“牙”字的用法比较活跃，到了“旤（没）厝做厝主”的地步，普通话“齿”称为门牙或前牙，涉及牙齿的词汇，有带“齿”不多见，大多以“牙”作主，如乳牙、门牙、白牙、蛀牙、牙疼、以牙还牙等等，强势地把“齿”排挤出口腔去，这事福州俗话谓之“正主搭旤（没）渡”。查证一下福州方言“齧”什么来历，汉朝许慎《说文解字》未收录“齧”字，而南朝梁顾野王撰《玉篇》字书，未收录“齧”单字，但有收录词语，齧【曾街切2】见《玉篇》齧齧，齿不平。通常造字滞后于语言，南朝时期造出“齿牙”合体的

会意字，“齧”看字形会意，就是指牙齿。据此辨析，顾野王南朝梁年间人，他编撰南朝官话字书，南朝属地“齧”就已存在，以词语“齧齧”收编入《玉篇》。而唐朝定都长安城，今西安，当朝官话字书没有收录“齧”字，也没有收录相关词语，这个“齧”在隋唐时期水土不服，被忽视。而在宋朝官话字书《集韵》再度出现“齧齧【时梳切5】”一词，《集韵》齧齧，不齐也。可见“齧”在民间方言中生根发芽，证实“齧”根在南方，南朝属地具有生命力并未失传。历史上人口迁徙，江淮地区方言带到福州，福州话口口相传至今，“齧”源脉至少可溯源到南朝，不少于1500年的历史，可谓是福州方言中一颗亮晶晶的珍珠。

福州方言带“齧”字的俚语

1. 蜀脸单单齧（满脸全是牙齿）。注：蜀【读若镯】脸，一脸；满脸。单单，指单一；没有别的。疏：言人心情特别高兴，裂开大嘴笑开怀，脸皮遮不住牙齿，一脸尽显牙齿。这句话生动描述满心欢喜大笑的脸部状态，言语极其夸张，十分幽默会意。寓意：特别开心，满脸堆满笑容。

2. 乞齧疼样（与牙痛一样）。注：乞【气舒切4】，《汉语大字典》与。疏：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你命，疼痛厉害会不由自主不停呻吟，让人厌烦。寓意：骂人没完没了，啰哩啰嗦，讨厌。

3. 旡齧好喫骹柄（没牙爱吃猪蹄）。注：旡【读若毛】，《汉语大字典》方言，无；没有。喫【时枝切8】，《康熙字典》食也；饮也；啖也。骹【气嘉切1】柄，猪蹄。疏：言人没牙齿偏爱吃猪蹄，明明咬不动，就是偏好吃。讽刺人没本事，对某事没法子又爱做。寓意：做不了的事情偏要做。

4. 旡齧喫豆汪（没牙吃豆腐）。注：喫【时枝切8】，《康熙字典》食也、饮也、啖也。汪【莺宽切1】读若弯，《汉语大字典》水聚积。豆汪，豆浆水聚积凝固而成水豆腐。疏：水豆腐软软的，吃它不费牙齿撕咬咀嚼，吞咽即可，正

适合没牙齿的人吃。寓意：正好对路。

5. 乞依齧笑邊呵（被人笑掉牙）。注：乞依，指被人。依【读若聾】，《康熙字典》吴人谓人依，即人声之转。邊【读若段】，《集韵》失据而倒也。指落下；丢失。疏：言人做出的事情被人耻笑，笑掉牙齿了。这种夸张俚语，非常强的场景感，让人嚼味。寓意：被世人所耻笑。

6. 由齧缝呢俭出速（从牙缝里节省出来）。注：呢，表示语气，无实际字义。速【柳伊切5】读若梨，《康熙字典》来也。疏：言人生活节俭省吃，像挤在牙缝隙的细微食物都舍不得多吃。寓意：财富靠极度节省得来。

7. 齧血都俭出速（节俭到出牙血）。注：速【读若梨】，《康熙字典》来也。疏：人如果太节俭，舍不得吃，造成营养失去平衡，身体缺乏某种微量元素，会导致牙龈炎，牙龈糜烂出血。寓意：极度节俭。

8. 齧共喙舌都挨相碰（牙齿和舌头都会相碰）。注：喙【出归切3】，《汉语大字典》鸟兽等的嘴；人嘴。疏：嘴里的牙齿和舌头十分亲密，有时牙齿还会咬着自己的舌头。寓意：再亲密的关系难免磕磕碰碰。

9. 齧咬铁铁模（牙咬得很紧）。注：模【读若邓】，《汉语大字典》模，木理坚密。引申指坚硬。疏：当人遇到痛苦或困难时，身体本能就会咬紧牙关尽最大努力忍受痛苦或克服困难。寓意：言双方关系僵硬不化。

10. 齧根咬呢啾啾訃（牙根咬得啾啾响）。注：呢，表示语气，无字义。啾啾【波装切4】，咬牙发出的声响。訃【求梳切3】，《博雅》鸣也。疏：当人遇到痛苦或困难，咬紧牙关发出的声响，压抑心中怒火。寓意：强忍深仇大恨。

从以上福州话俚语中，不难看出福州方言的语法、字词、读音与普通话有着明显差异，福州话这些俚语都源自古汉语，古汉语活化石露出端倪。

辨析福州话“喫”字源脉

福州人进餐叫做喫饭，赴宴叫做喫酒，喝茶叫做喫茶，抽烟叫做喫薰（香烟），大凡进嘴的通通叫做“喫”。我国疆域广袤，在南方和北

方，河东与河西不同地域以及食品存在形态不同，这个“喫”法还有得讲究。如，吃固态食物谓之吃或食，流体食物谓之喝或饮，气体烟雾谓之吸或抽等等。从古到今在不同历史时期，进食称谓还有啖、茹、啗等等，以下辨析不同“喫”法。

1. “食”字古汉语字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扩展：据汉朝《说文解字》食，一米也。未去皮壳者为粟，已舂去糠则为米。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与小豆、小麦三者无米，故云九穀六米。上古时代“食”指五穀粮食，从南朝《玉篇》食，饭食。“食”字义开始引申为食物。到宋朝字书《增韵》食，穀饌也。又茹也，啖也。“食”字义又有引申，在酒肉饭菜上再引申为“喫”。

2. “吃”字本义，《说文解字》注解，言蹇难也。《前汉·周昌传》为人口吃。又与喫同，见汉代贾谊《新书·耳庠篇》越王之穷，至乎吃山草。这个“吃”字义从前秦口吃，在汉代引申为“喫”。

3. “喝”字义，初始典籍记载，《战国策》恫疑虚喝。《玉篇》嘶声也。《集韵》飮声。《广韵》本作噉，诃也。《集韵》呼也。

“喝”，辨其字义引申演化过程，汉代前本义为恐吓威胁。南朝引申为声音悲咽、嘶哑。宋朝噉食之声；呼喊；诃斥。另有北方称饮为喝，当今普通话饮谓之喝。福州话“喝”还是沿用古汉语的用法，如俚语有“喝蜀喝鹅变呢鸭”“喝鬼骂人亡”“喝诗”“喝彩”等等，福州话只有“呼喊、诃斥”字义。

4. “啖”字义，见《韩非子·外储说》孔子先饭黍，而后啖桃。《说文解字》噉啖也。《前汉·王吉传》吉妇取枣以啖吉。宋朝《广韵》同啗。《集韵》噉也。在汉朝“啖”字义为咬吃，多用于吃树果之类食物，到了宋朝把“啖”字义引申为两项“咬”和“吃”。福州话字词有“派啖”一词。注：派【波嘉切5】，多条支流汇一流。古人在野外发现树有挂满熟果，叫来一群同伴共享果实，谓之“派啖”。引申指聚合在一起聚餐。

5. “饮”，《玉篇》咽水也。《周礼·天

官·膳夫》饮用六清。郑玄注：六清，水、浆、醴、凉、鬻、醕。此即“六饮”也。后用以泛指饮料。又《酒正》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鬻、三曰浆、四曰醕。清谓醴之沛者，鬻即内则以醕为醴者，浆今之截浆，醕今之粥也。注：酒正，酒官之长，后用以称朝廷的酒官。可见“饮”历朝历代官话作名词称谓饮料，用作动词指进食流体食物。见于《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江淮官话方言“饮酒、喝茶”还是讲“食酒、食茶”，福州话类同江淮官话方言，也是讲“喫酒、喫茶”。

6. “茹”，《易·泰卦》拔茅连茹。注：根相牵引貌。又食也。《礼·礼运》茹毛饮血。《孟子》饭糗茹草。《庄子·人间世》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又食菜曰茹。《前汉·董仲舒传》公仪子相鲁，食于舍而茹葵。《王莽传》不茹园葵。“茹”字古代用法多指吃蔬菜之类。

7. “啗”，《说文解字》食也。《广韵》噉也。注：噉同啖。

8. “喫”从口契声，老福州人说官话，“吃”就是读成“契”音。古代字书“喫”字义，《说文解字》食也；《玉篇》啖，喫也；《正韵》饮也。到了宋朝汉字数量实在太多，读书人很难掌握这么多字，阻碍文化传播和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字义有一些扩展，废弃一些相同字义赘字，如，“茹”“啖”“啗”等等不常用，字义回归同“喫”。

上古汉字数量不很多，属于汉语混沌时期，秦始皇嬴政推行“语同音、字同形”，秦朝官场统一汉字规范。古代汉语进入一字一义一音的发展阶段，汉朝这时期《说文解字》字书，共收录汉字不足一万。人们生活口语比较丰富，《说文解字》这一万字显得捉襟见肘。汉字不够用，历朝官话造出不少新字，到了宋代《集韵》共收集五万三千多字头。单单“喫”细分多种不同情况用不同的字表达。如，饭食曰食，树果曰啖，蔬菜曰茹等等。上古时期，进嘴的不分“食、饮、啖、茹”，总称谓“喫”。福州人的“喫”如出一辙，这个字源可溯源至上古时期。

注：【】内为福州方言八音注音。

《荔枝换绛桃》： 福州特色的中国式悲剧

◇ 邹自振

闽剧，俗称“福州戏”。它一向以其平民化、世俗化的审美观照和浓郁的乡土特色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其中，闽剧《荔枝换绛桃》就是具有福州特色的中国式悲剧模式的典型。它被誉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福州版，为一部具有福州地方特色的中国式悲剧。

苦乐相错，悲欣交集

中国悲剧“在情节结构和情绪展示方面，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始终体现出哀乐相生、悲欢互转、以喜衬悲、悲欣交集的总的基调”。而这种喜乐，不仅仅只是随意添加的佐料，而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有机成分，可使读者“忽而毗尽裂，忽而颐尽解，又忽而若醉若狂，又忽而若醒若悟”。情绪转变之多，使人消除了一种单一化的美感。这种悲喜相衬的手法，不仅不会抵消悲剧效果，反而更有强化之功效。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就是这个道理。《荔枝换绛桃》就运用了这种苦乐相错、悲欣交集的艺术手法。剧中的“乐”与“欣”不仅仅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美学范畴，更多的可以体现出喜剧手法在悲剧中的运用。在剧中，这种喜剧手法的应用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1）调侃手法

《荔枝换绛桃》的故事发生在端午时节。中国传统的端午节都有划龙舟的习俗，为的是凭吊屈原，而“福州的龙舟竞渡则来源于‘钓白龙’，与凭吊屈原有别。所谓‘钓白龙’，传说西汉时期闽越王余善率众反汉，事前在福州城南临江筑台钓白龙，争取百姓支持。当时余善让人用木头雕成白龙，浮在南台江上，让沿江各部落的健儿驾船夺取，谁夺得谁就胜利。后世发展为一年一度的龙舟竞赛，从五月初一到初五，参赛龙舟中不少以白龙头、白蛇、青蛙等作为舟首标志”。

《邂逅》一场中，艾敬郎与冷霜婵就是在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中初遇的。这一场充分体现了调侃手法的运用。调侃手法，即俗语所说的“开玩笑”。既无损正面人物形象，又有助于强化悲剧中的喜剧成分。这场中，归大娘和冷霜婵的聊天对话就体现出了一种典型的调侃手法的运用。冷霜婵对艾敬郎颇有好感，却因为女儿家的矜持不敢向归大娘打听有关艾敬郎的消息。归大娘看在眼里，嘴上却不明说，先是谈“知否西湖渊源”，再谈“今日西湖热闹非常”，最后又说到“离荷亭半里路，那边是西涧这里

去西门。”归大娘天南地北地说，却惟独不提艾敬郎。此刻的冷霜婵焦急万分，频频暗示，要谈“现在之事使我了然”，“不听你讲天气”，“别件事不必讲，只要讲此刻——”步步逼近地暗示归大娘，却也惟独不提艾敬郎。在这样两相僵持之下，一句归大娘的旁唱揭示了原来归大娘有意“装傻”：“分明霜婵话难出口，我看样式猜她腹肠。她既然不说我也许眠梦，看看是谁先看言。”很显然，归大娘对于冷霜婵对艾敬郎的爱意是明白于心的，但却一再“装傻”，这就“苦”了冷霜婵，使她陷入了欲言而又不欲言的境地。而读者也完全知道归大娘在装傻，因此充满了淡淡的喜剧味道。调侃喜剧手法的运用创造了一种抒情色彩极为浓郁的喜剧环境，而这种环境愈是愉快的展现，愈是让悲剧的结局突显出一种撕心裂肺的疼。

（2）使人愉悦的情节运用

“苏国荣先生把我国古代悲剧的情节进程概括为‘喜——悲——喜——悲——大悲——小喜’。”而“喜”与“悲”的情节的反复使人一改对“一悲到底”的悲剧的审美疲劳，产生一种情绪上的量的递变。当然，我们必须提到的是，所谓的“喜”并不能遮盖“悲”的光环。相反，只会让“悲”愈加突出。

在《荔枝换绛桃》的第五场《巧遇》中就体现了这种“喜”的运用。七夕，相传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日。“闽俗多在庭院中设香案，青年妇女拜织女星，乞讨灵巧的双手，祈望能织出美丽的锦绸来。乞巧时，以‘七’作为‘巧’的象征，陈列瓜果七盘，茶盅七个，银针七根，绣花丝线七条。在月光下比赛‘引七线，穿七针’，谁穿得准，穿的快，谁就得到‘巧’，这是福州特有的习俗。”《巧遇》一场以七夕佳节的喜庆气氛作为大背景，表现出了这种“喜”的运用。七夕，冷霜婵与艾敬郎隔河巧遇。两人诉说真情，以解相思之苦。虽有一河之隔，但已私定终身，百般恩爱，让人如沐春风。这种喜悦感受的情节，确实一时会令人忘记了这是悲剧，但却丝毫无损整部悲剧所带给人的强烈的震撼力。关键在

于这种由喜转悲的突然。七夕相遇的美好还未完全消退，冷霜婵就被闽王强行征选入宫，随后二人双双投入烈火之中，为爱殉情。这种情节上的安排是以最为直接的形式加大了一种由喜转悲的情感落差。相比较调侃的淡淡喜剧效果，这种温馨的氛围瞬间被破坏，所带来的悲剧震撼力更加强烈。正如龚鼎孳《戏剧偶感同于皇（杜濬字）作》中提到的“欢入笙箫变，晴看雨雪来。盘涡天一折，裂石鼓三催。”谈的就是这种情感的转变。

（3）误会与巧合

以误会与巧合的方法组织出的悲剧中的喜剧效果，不禁让人莞尔。这种戏剧手法的运用，一般是在男女主人公互诉情意，表白心意之时，虽不能成为一种“悲”的反衬，却可以说是“悲”的前提。没有喜悦相爱的出现，又何来有离别的痛苦？在第二场《投荔》中，就多次使用了这种误会与巧合的喜剧手法。误会与巧合的发生必须以恰当的时间、地点作为一个前提。《投荔》情节发生在福州三坊七巷的桂枝里，这就为误会与巧合的发生创造了一个合适的地点。“桂枝里河沿与吉庇巷平行，河北岸的吉庇巷人家将后门埕的建筑对准了小河，为了充分利用河道的便利，欣赏小河的风光。大多数人家都沿河驳岸撑起了木柱，搭盖起的小楼延伸到了河水的上方，成了沿岸而居的吊脚楼。吊脚楼往往是书生读书作画的地方。河南岸的桂枝里在河沿留出了一条植有古树的小街。街的南边也朝北搭盖着不少木构小楼，楼上大多住着未出阁的小姐。”这种特殊的建筑结构使得艾敬郎与冷霜婵能够隔河相望，又不暴露于人前，让误会与巧合的发生成为一种可能。《投荔》一场中，艾敬郎欲将荔枝收入画幅之中，却被冷霜婵误认为“莫不是口干思饮”，见艾敬郎下楼之际，冷霜婵欲“采摘荔枝与他止渴”，“表我一片情义”。可见霜婵有情，但如果没有这次误会，也不会造就一段姻缘。紧接着，艾敬郎得知冷霜婵投予他荔枝感动不已。恰时，舒氏拿绛桃上，见画中荔枝，追问：“这是什么？荔枝？”艾敬郎以为心事被发现颇为惊

慌，手忙脚乱地急把画遮盖住，造就了第二个误会。艾敬郎借用李义山的诗句“身无彩凤双飞翼”题在绛桃上，投向冷霜婵以表心意。而冷霜婵由于矜持假装刺绣。见无动静时，正要上前拾起绛桃，不料容氏走上阁楼。霜婵急中生智，将裙子罩在绛桃上，并催促容氏快点下楼。形成了第三次巧合。冷霜婵又投以艾敬郎荔枝，并用绣笔题上“心有灵犀一点通”。艾敬郎拾荔，颇喜。心不在焉地说道：“荔枝，荔枝，这荔枝心有灵犀一点通呀。”舒氏以为艾敬郎中暑而看着荔枝说胡话，却不知此荔枝非彼荔枝。这又造成了第四个误会。《投荔》全场都是在误会和巧合中度过的。容氏和舒氏频频出现使得两人原本埋藏在心里的情感慢慢地明朗化起来。巧合与误会的出现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它肯定了冷霜婵与艾敬郎彼此之间的感情，读者们从第一场《邂逅》就知道了艾敬郎与冷霜婵一见钟情，但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却完全不知彼此的心意。我们就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注视着剧中人在“迷宫”中跌跌撞撞。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种误会和巧合不能够让悲剧产生更强烈的效果，但却是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这种误会和巧合造就两人的相爱，从而才能产生结局的为爱殉情。郑寅寅先生在《中国戏曲文化概论》中提到：“一旦去掉这些喜乐成分，绝大多数悲剧作品就无法存在。”充分肯定了误会和巧合的重要性。

哀之所至，柔以言情

悲剧就是“透过人物的失败与毁灭凸显精神的昂扬与生命的壮丽。悲剧精神的精髓即是对悲剧性人生遭际的反抗”。在这句对悲剧本质的概括中，我们除了应该注意到“悲剧精神”这个关键词以外，还应当注意到“人”这个关键词。以“人”为本的悲剧的存在，就要求突出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国悲剧素以塑造女性悲剧人物形象而闻名。与西方悲剧的男性主人公不同，中国悲剧将女性作为悲剧的“语言符号”。这种地位上的安排是由于我国古代妇女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除了受到族权、神权、父权的约束之外，还



闽剧《荔枝换绛桃》剧照

要受夫权的控制。嫁而从夫，夫死从子。女子在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男人的奴隶。孔子也将女子与“小人”排列在一起，认为他们是最“难养”的。而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却深深打动着剧作家们的灵魂。正如刘洪先生在《中国古典悲剧的形象类型》中所提及的那样：“这一‘群体’虽无什么惊人的业绩，但她们的无辜和不幸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内容。”现实的不幸更加要求在戏剧创作过程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完美的结合，是由被动转为主动的一种突破。《荔枝换绛桃》中的冷霜婵就是中国悲剧中女性形象的典型，同时她还具备了福州女子所特有的修养与气质。冷霜婵这个人物形象展示了福州女性自强、自立、率性的一面，更从侧面反映出福州较为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和尊重女性的女权意识。这个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文艺作品中女性柔弱、饱受欺凌的模式，闪烁出一种反批判、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的新思想。

(1) 主动的意识

在《荔枝换绛桃》中，冷霜婵不仅具备了古代妇女的矜持和羞涩，与艾敬郎相比，冷霜婵更加具有了一种主动的意识形态。如：第二场《投荔》中，霜婵见艾敬郎“不时瞟目荔枝”，误以为“口干思饮”，于是投荔为其解渴。值得注意的是投荔行为是由冷霜婵主动进行的，相比艾敬郎在第一次邂逅后的毫无表态，无疑是一个大的突破。当然，冷霜婵的内心也挣扎过，“念男女须避嫌疑”的礼教观念也曾试图阻止她的大胆举动。但最终霜婵还是走出了她爱情道路的第一步。再看第三场《试探》，霜婵与艾敬郎已经互生爱意，因此舒氏以为儿寻访名医治病为由试探冷霜婵的心意。在这一环节中，冷霜婵又占据了一个主导位置。一句“你何不去找归大娘”，更是大胆的表露出可以请归大娘来提亲的意愿。相比之下，艾敬郎虽然爱慕冷霜婵却不敢直言婚配问题，反而让舒氏代劳试探冷霜婵。而霜婵则显得更加大胆主动，对舒氏的试探虽表现出了小女子之娇羞，然而最后提示找归大娘则把自己的心事坦坦荡荡地表露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不禁令人钦佩。

（2）完美的化身

冷霜婵在全剧中不仅仅处于一个主导的位置，同时也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正如郑传寅先生所说的那样：“我国古典悲剧不但以女性主人公为主，而且多半不写主人公的过失和缺陷，他们通常是完美无缺的。”我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一个人物的完美，主要可以从外在与内在两个方面看出。《荔枝换绛桃》中并没有明确的语言对冷霜婵的外貌进行描写，但从王延翰的言语之中，足见霜婵之美。“看此女有此天姿国色，怪不得州官选进宫廷。”“孤见她天姿国色，真足以压倒群芳。”霜婵外在的美是毋庸置疑的。而内在的美主要是通过性格体现出来，正如王季思先生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序言》中所说的：“我国古典悲剧的美感教育作用，主要是通过悲剧主人公的性格展示给观众的。”冷霜婵在性格方面，我认为最为突出的就是一个“反”字，从反礼教到反恶势力，霜婵都做出了别于同

时代女性的举动。我们这里的完美并非以中国古代妇女的形象作为模范，而是以一个自主的人的模式作为典范。在《礼记·昏义》中有这样一句话：“昏礼者，礼之本也。”因此对于礼教的一种反抗，从根本上就是对“婚姻”的反抗。这里的“婚姻”指的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态度。确切地说，冷霜婵的反礼教行为就是一种自择佳偶的行为。从最初的向归大娘试探艾敬郎的为人，发展到投荔表情义，接着让舒氏找归大娘做媒，然后与艾敬郎七夕河边巧遇互诉衷情，直到最后抵抗王延翰的强抢行为，以极端的死亡方式与艾敬郎共赴黄泉。种种行为都不该是一个中国古代妇女应有的举动，但却在冷霜婵身上集中体现了出来。对于封建社会视为“淫”的爱情，却是冷霜婵一生所追求的幸福。虽然最终她和艾敬郎的爱情不是被封建礼教所扼杀的，但丝毫不减她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情绪。冷霜婵的另一“反”是反恶势力。这种恶势力代表的是封建统治势力。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权豪势要或权豪势要之家的子弟，由于权重势高，有恃无恐，故无恶不作。王延翰就是倚仗世袭的闽王的身分，见到冷霜婵的美貌后，执意要将她选入宫中，若是霜婵不从就用火活活烧死她与艾敬郎。对于这种大众称为“吃仓廩的鼠，脓血的苍蝇”的权豪势力，冷霜婵的反抗是激进的。我们将这种激进反抗的悲剧人物形象称为“有为型”悲剧形象。这种人通常“能够自己察觉悲剧命运，而且主动选择悲剧命运。‘明知其不可为之’，他们主动向命运、现实社会挑战，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牺牲自己，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或维护自己的尊严。”冷霜婵的“民女有夫，不受乱命”、“我早知这是与虎谋皮”，都反映出了这种“有为型”悲剧人物形象的特点，而最高潮的是她用死亡的方式捍卫了自己的爱情。对于冷霜婵来说，“人生的真实内容并不仅仅是生命。生命对于某些人并不是人生最高价值和最高目标，在他们看来，廉价、平庸的苟活，还不如为一个理想、目标壮壮烈烈地死”。正如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说的：“死亡

本身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人在死亡面前做些什么。”

先否后喜，哀而不伤

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充分体现了国人的审美崇高。”王国维先生的这句话也恰恰体现了中国戏剧所具有的一个共性。《荔枝换绛桃》也是这种共性下的一部作品。“闽剧传统剧目中即使剧情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悲哀、悲痛甚至悲惨成分，但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团圆的、欢喜的，这种知命乐天，苦中寻乐，坚强又达观地看待生活，看待命运，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心理往往是民众对黑暗无奈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自然心理调节。”应该说，戏剧结尾的“大团圆”是我国悲剧艺术审美主体表现手法的主要色调。然而我认为这种“大团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圆满。请看《荔枝换绛桃》的结尾：

起火——

[武士应声。殿下火势熊熊而起。

[艾敬郎、冷霜婵怔怔地对望。

[伴唱：夫妻火里化鸳鸯

[艾敬郎、冷霜婵投入柴塔，烈焰飞空。火里飞出一对鸳鸯，腾空飞起。

[王延翰及武士均为怔倒。王延翰从此一病不起。

[幕落。

这里描写的是冷霜婵不愿被王延翰纳入后宫而遭受火葬的结局。如果是真正意义上的团圆，那么在结尾应该是一团喜气洋洋的场景，而并非以一种类似愤恨中忧伤的情绪来充斥整个剧终。我十分同意苏国荣先生对于这种结局的看法，他在指出我国戏剧中有悲剧作品存在的同时，又指出，追求团圆之趣的某些悲剧“并不纯粹”。在我看来，这种“不纯粹”主要指的是在冷霜婵与艾敬郎双双殉情之后，出现了一些“安慰性的小喜”。如：“火里飞出一对鸳鸯，腾空而飞”，“王延翰及武士均为怔倒，王延翰从此一病不

起”这种“补恨”的方式，是让冷霜婵与艾敬郎追求的自由爱情遭到毁灭之后，以一种虚幻的形式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补偿。正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说的那样，民众视剧作的“团圆之趣”为一种“必须”。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必须”就不是悲剧，因为这种结局只是在阴霾蔽日的云隙里投下一束微弱的阳光罢了，并不能改变悲剧冲突的性质和全剧的悲惨基调。应该承认的是这种先否后喜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民众的心理愿望和情感需要。但我认为它在另一个层面上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就是实现一种精神上的暗示。在《荔枝换绛桃》一剧中，冷霜婵与艾敬郎以鸳鸯腾飞的“尾巴”作为结局，这个“尾巴”虽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但却能在民众之中留下一个观念，即表现爱情超越生死，即使两人的肉体不复存在，却能以一种意象来完成一种重逢，是对这种美好追求的一种肯定方式。另外王延翰在看见此情此景之后十分震惊，到最后甚至一病不起，更是与中国人自古以来认为的“恶有恶报”的观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冷霜婵与艾敬郎生前苦苦哀求，希望获得幸福却无法实现，最终以双双殉情作为结局时，剧作家就以老天为名义达到一种“人压倒对象”的愿望，从而暗示一种因果报应的文化理念。纵观全剧，冷霜婵与艾敬郎化作鸳鸯腾空飞起，在激愤中不免有些悲哀，不由令人想起《娇红记》的结局：“两鸳鸯，双飞枕头，似啼鹃哀鸣树头，觑山空水悠，白水天际，千载悠悠，一丝愁情，甚日还休，叹叹累累满目荒丘，回首处，涕交流。”两剧同以化鸳鸯的浪漫主义手法作为一种结局，却在无意之中增添了悲剧的氛围和色彩。以乐景写哀，“欢乐的尾巴”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欢乐。

《荔枝换绛桃》以其独特的福州风俗民情成为民众所喜爱的中国悲剧，文章从悲剧中的喜剧成分，以女性主导的悲剧以及独特的“大团圆”结局这三个方面论证了《荔枝换绛桃》是一幕中国式悲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了剧中的福州风俗民情，从而让《荔枝换绛桃》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闽侯张氏祠堂



石震黄岐



港号甘棠

张睦历史贡献管窥

——闽侯张氏祠堂的碑记、匾额

◇唐浩茫

在研究福州甘棠港中，我们发现王审知领导团队中一位重要人物——张睦。

张睦，生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县魏陵乡祥符里，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初任光禄大夫。

唐朝中和元年（881）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黄巢起义攻陷长安，僖宗西逃入川。安徽寿县人王绪聚众起义，占领光州。张睦领二十四姓难民并携家眷跟从王潮、王审知兄弟义军。后遭蔡州节度使秦宗权讨伐，遂率光州、寿县五千多民众随义军南下，从江西进入福建，连下汀州、漳州等地。到南安时义军竹林兵变，囚王绪，王绪自杀，大家拥戴王审知为帅，王审知恭让其兄王潮率军。其时，泉州刺使廖彦若为政贪暴，百姓叫苦，义军为民请命，于光启二年（886）攻占泉州，杀了泉州刺使，并自愿归顺唐朝廷。唐福州观察使陈岩报请朝廷，朝廷命王潮为泉州刺使。公元892年陈岩卒后，其婿乱政，王潮命王审知率军攻之。张睦就随王审知军队苦战一年，于景福二年（893）五月攻占福州。王氏据有了八闽大地，张睦也卜居于侯官县孝悌乡惠任里。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王潮卒，闽侯张氏祠堂碑记《入闽始祖张睦公传略》记载：“昭宗拜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封琅琊王，既总藩府。（王审知）请命于唐，授张睦三品官，领榷货务，实管机要，俗传为头厅者。”张睦祖上就是名门望族，其本人在唐僖宗乾符三年已有功名，任光禄大夫。在天下大乱形势下，委身于王氏兄弟义军队伍。因为张睦有名望又有

文化，在农民军队中颇受尊重，成为王氏兄弟领导团队的智囊，在王氏集团决策和谋略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他的政治地位，所以在王审知治闽期间他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首先，在政治上是守藩，还是立国问题上，始终劝说并影响王氏领导集团，他极力主张“禀唐正朔”，向北方王朝“称臣纳贡”，以避免被朝廷讨伐，换取八闽大地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王审知完全赞同他的政治主张，以“宁做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为决策。同僚中有主张独立，断绝朝贡之议。《张氏入闽始祖睦公传略》记载：公（张睦）为避免纷争杀伐，涂炭生灵，力主统一，忠懿守藩。二十九年奉朝贡不绝，终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此皆（张睦）公开导扶掖之力。”可见王审知主政八闽期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是因为始终奉行“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的正确决策，而张睦扶佐王审知政权29年中，始终“朝贡不绝”，维护着这项决策，使正确政治主张得到一以贯之执行。

不仅如此，在经济发展上他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他主张开拓对外贸易，并制定合理的商贸政策，以管理商贸往来。

《张氏入闽始祖睦公传略》记载：“时当兵革扰攘之际，财政困难，人民贫困。公临难授命，勇挑重担，采取发展生产，开拓对外贸易。（张睦）能雍容下士，招徕海上蛮夷、商贾，敛不加暴……商贾往来增多，贸易兴旺，因而足国裕民。”

另有一事，在此不得不提，即“炸礁拓港”。

当时，他主张移除闽江出海口的横石嶙峋，确保福州湾出海航道畅通，船舶出入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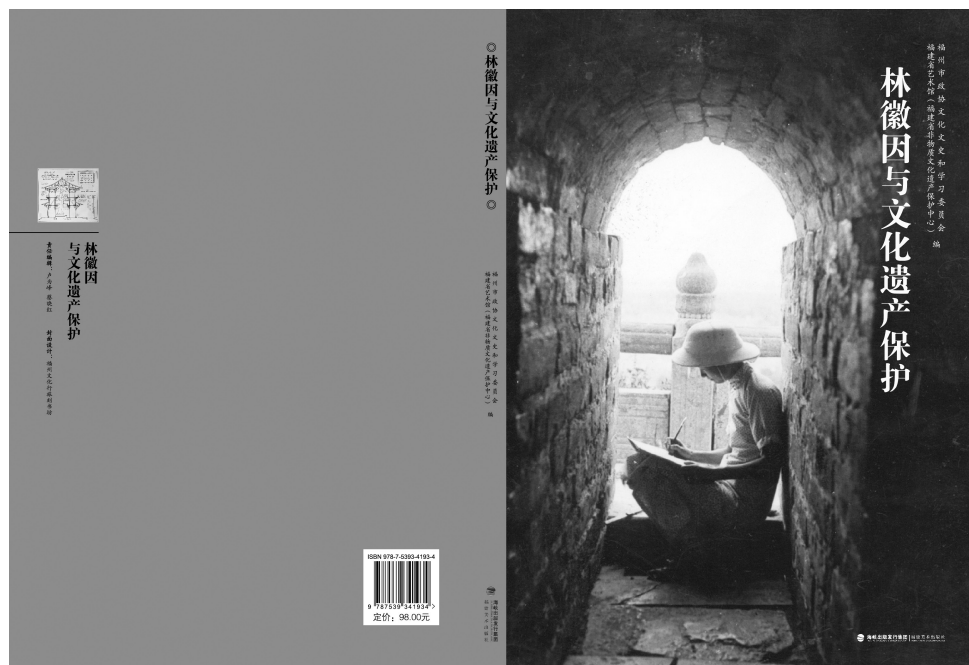
唐朝时期，福州是水上交通要道，但由于出海口有巨石嶙峋，怪石惊涛，覆舟害物，番舶来去，时遭覆

溺，成为福州湾出海航道的“鬼门关”，发展对外贸易的“拦路虎”，要大力发展外贸，就必须除掉这个拦路虎，突破鬼门关卡。但这是天大的难事，是“累代不能除”的大难题，但张睦迎难而上。其“传略”载：“公请命凿之。一夕忽风雷大作，将石击开。辟筑工程六年始完成。从而通航无阻，商贾往来增多，贸易兴旺……人以王之福，及公（张睦）之德政，号曰甘棠港，获颁德政碑。”这些史实也得到《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印证。张氏后人将其请命炸石辟港与疏通出海航道之事，作为张睦一生重大功绩加以记载、宣扬。

闽侯张睦祠堂院墙圆拱上方向外塑一长方形大匾，书写“港号甘棠”四个大字，向内塑一长方形大匾，书写“石震黄岐”四个大字。“石震黄岐”，是说当年巧用雷雨交加自然气象，烧裂闽江出海口的横石嶙峋，移除航道上的礁石，拓宽航道。“港号甘棠”匾，即唐帝为旌表其事迹而赐。



张睦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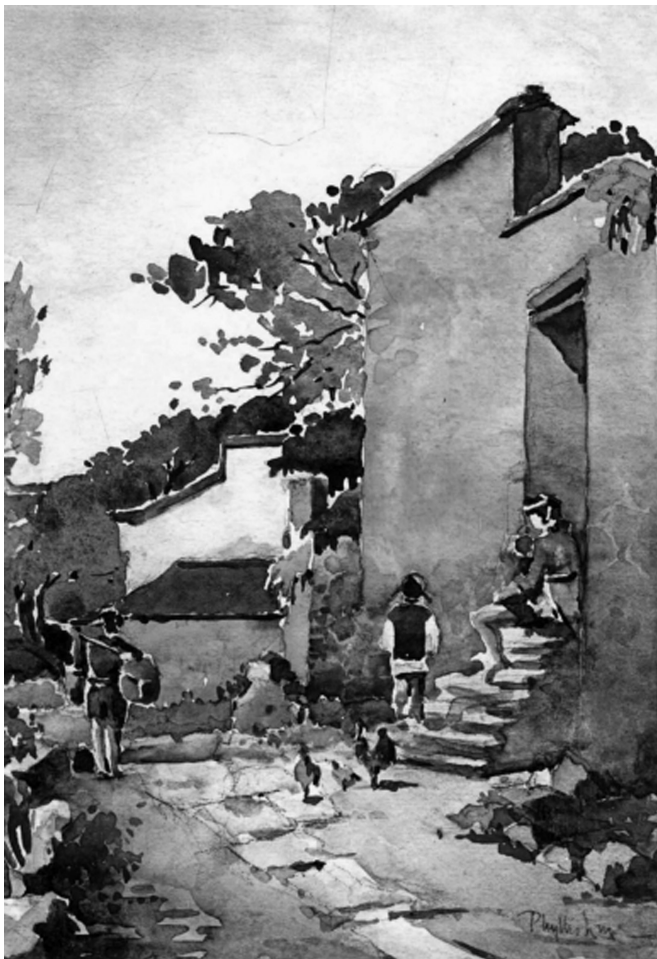
《林徽因与文化遗产保护》评介

◇陈常飞

许多人都读过林徽因的诗歌与散文，如《你是人间四月天》《窗子以外》。她起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位作家，这方面成就早为人知。但林徽因其实是一位集建筑学、美术、诗歌、散文于一身的才女。她博学多才，在所涉猎领域都有建树。作为一位美术家，她以艺术的眼光和对文化的深厚素养，热衷于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亲自设计或精心指导了许多辉煌的创作；作为一位学者，她与梁思成珠联璧合，肇建了中国建筑学。在抢救和保护古代建筑及文化遗产事业上，她不畏艰辛，作出了巨大贡献。她的人生理想与事业追求，正如《莲灯》中所表达的：“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荧荧虽则单是那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即将在福州市举办，这是世界了解福州的一个“窗口”，是展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次难得机遇，也是推动“闽都文化”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时机。我们以此为契机，编纂《林徽因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书。

此书由福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和福建省艺术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主编。历经三年，数易其稿。该书分为五章：第一章“系出名门 家国情深”分为六节：“一门多才俊”“法政称先驱”“天民多艺能”“觉民意志强”“昆仲皆义勇”“九个弟弟”。本章主要叙述林徽因的家族成员事迹，阐明了林氏族人的精神与品格对林徽因幼年到青年时期的影响。林徽因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种家风传承的环境中生根发芽。正如史学大师陈寅恪所



林徽因《故乡》



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

说：“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第二章为“求索考察 钟情建筑”。本章通过“探寻中国古建”“正定古建筑的发现与保护”“应县木塔的发现”“书写中国建筑史”“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林徽因与费慰梅的交游”等几个事件，演绎她倾情于古建保护的经历与成就。第三章“智者教泽 师者风范”，主要描述林徽因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和在新中国初期的一些事迹，包括设计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须弥底座，保护、抢救传统工艺，指导学生创新景泰蓝样式、图案等事情的经过，论述其建筑思想和成就。林徽因一生倾注于文化遗产的考察和保护，为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实践及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她的传奇经历，使无数国人为之感动，有关的回忆文章不乏书籍记载。

第四章精心选录若干篇“忆文”，从其亲人、朋友、学生的角度叙述其人，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读者也可借此进一步了解她的文化情怀和事业成就，乃至她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方面的风格等。第五章整理她的建筑文论，并将之分为“建筑综论”“论外来建筑”“论建筑工艺”“论建筑学研究”“论建筑美学”“强调实地考察”等部分，以便读者对其学术思想有基本的了解。

林徽因才华横溢，正如其子梁从诫所言：“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母亲有她独特的作风。她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一处半圯的古刹，常会给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启示，使她禁不住要创造出‘建筑意’这么个‘狂妄的’名词来和‘诗情’‘画意’并列。”读她《平郊建筑杂录》一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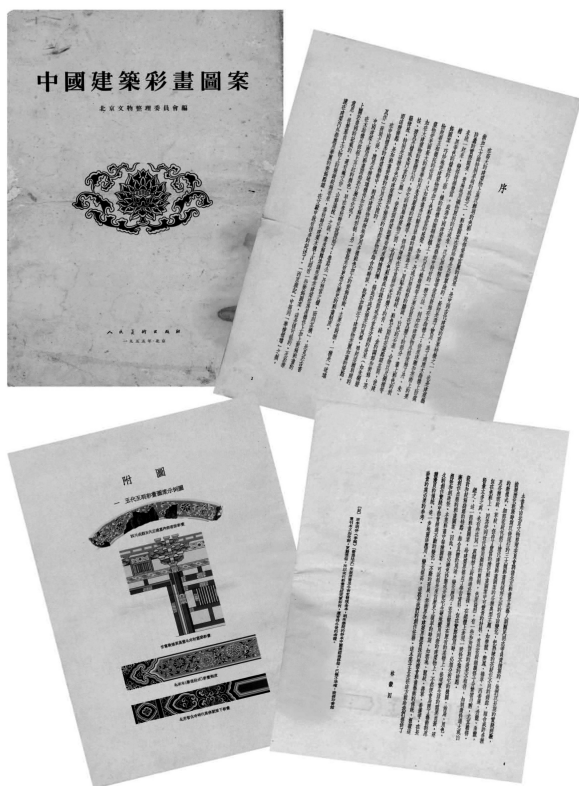
可见其才情。为了让读者对林徽因保护古建筑和文化遗产的事迹有更系统、更明晰的了解，我们还参考相关研究著作及资料等，编写“林徽因保护文化遗产简谱”，系以年月，述其事迹。

在整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为了获取更多信息，我们深入考察，调研了在福州与林徽因有关遗迹，如仓山可园、林觉民故居、福涧麻王庙等，寻访实物资料。古云：“文章最忌随人后”，编书亦如是。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有关作者还专程赴京，拜访林徽因的学生常沙娜，清华大学吴焕加教授、林徽因外孙于晓东、林洙女士等人，通过他们的口述回忆和所收藏的“遗珍”等，以为写作的素材之一，从而能脱前人窠臼，使本书呈现出新意。

本书总体风格“现场感”较强，故使读者开卷备觉亲切自然。全书脉络清晰，逻辑有序，“顺理成章”，以时间轴为暗线贯穿全书，使“情节”连贯发展，各个部分有机结合。本书故事性较强，相关故事穿插在叙述中，避免了单调论述和资料罗列。作者对所掌握的历史故事兼下议论或说明，从而避免平铺直叙所带来的枯燥感。在文本的语言方面，讲求简练流利，这些都增强了阅读的感受。

本书全视角地追述林徽因保护文化遗产的全过程，书写她与梁思成等志趣相投、患难与共，一同戮力推进文化事业发展的生动场景。又通过林徽因多位学生的回忆，叙述她当时讲课内容、教学风格。这些回忆弥足珍贵，还原了她言传身教的真实形象。

刘勰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代人有一代之人“世情”，文章风格和功用也就不同，而林徽因的文章及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相信，通过此书可以让读者走近林徽因，感受到这位建筑大师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从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博大。



《中国建筑彩画图案》林徽因序（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时间：1955年



在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门口合影

邻霄去天知不远

◇ 蔡林



官员在邻霄台祭祀场景 约翰·汤姆逊摄（1871年）

邻霄台是福州乌山三十六奇之一，从清至上世纪50年代留下的影像资料而知，邻霄台由一组巨石和谐地聚集成“前广后高”的乌纱帽顶形态，在帽“后高”岩石的正前方，一溜石阶整齐延伸至顶端。

1839年摄影术诞生。三十多年后，被誉为“摄影界的马可波罗”的英国人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来到中国，携带笨重的玻璃板和乳胶剂以及制作曝光底版的设备登上乌石山之颠，为我们留下清代福州官员在邻霄台上祭祀的瞬间。照片留言“乌山顶上有一座敞开的祭坛，只立着一块粗糙的石头。到这里来要先登上岩石凿出的十八级石阶，再走过最后的三级台阶……在这个花岗岩制成的石台上，摆放着简单的方形容器，容器内盛满了香灰……”时至今日，弥足珍贵。

从宋以降留下的诗文、碑刻记载，乌石山制高点称“邻霄台”，它成为福州官员祭天之所，至少始于宋代。打开清人郭柏苍的《乌石山志》“邻霄台”词条，曰“一名清虚台，俗称进香台，在山之顶，楷书镌‘邻霄台’三字”。随后罗列了历代关于“邻霄台”的诗文。最先提及的北宋名臣蔡襄《登邻霄台》诗，是写于嘉祐六年（1061）。至于词条中“清虚台”一名，未见更早记载。

蔡襄分别于宋庆历四年（1044）、嘉祐元年（1056）两知福州，合计五年多。作为福州的父母官，他为民请命，减去了五代时州民丁口税之半、兴修水利六十九处、普种夹道松、倡医禁蛊……在此间未见有关邻霄台诗文，或因繁忙的公务无暇寄情山水。

查阅《蔡襄全集》得知，北宋名臣蔡襄的《登邻霄台》原题为《提刑司封以邻霄台佳什垂示辄成拙篇以答厚赐》。见题便悉这是蔡襄与提刑、司封两位好友的应答之作，诗友以“邻霄台”佳作示于蔡襄；蔡襄以这首“拙篇”答谢好友的厚赐。

提刑、司封为两个官职，“提刑”指蔡襄的好友、任过福建提刑的章君陈；“司封”是嘉祐四年至六年知福州的燕度，他与蔡襄同榜进士，称“同年”，有携手之情。一首写于嘉祐五年的诗《燕司封同年以诗见》（《蔡襄全集卷六》）正是蔡襄在离泉州任北上赴京，路过福州之时，拜会了任期中的燕度，抒发了岁月蹉跎，十年官宦的无奈以及怀旧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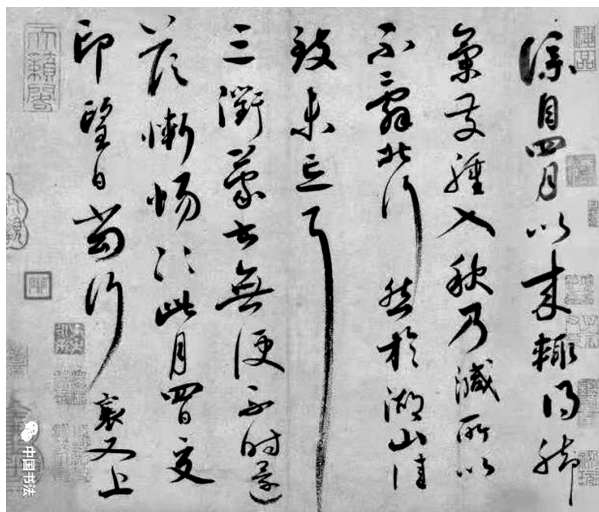
如此推来，嘉祐五年蔡襄在离泉州任返京城途中，无官一身轻，又适逢同榜进士燕度知福州，顺道拜见老友。时任福州父母官的燕度尽地主之谊，陪老友登顶四望，或约任过福建提刑章屯田同往。这首诗作于次年即嘉祐六年，是蔡襄收到诗友佳作后，激起了遐想，欣然命笔而为：

低徊倾北斗，突兀起东闽。
 缔结青云上，登临沧海滨。
 溪山来面势，歌吹彻穹旻。
 子夜看先日，阴崖后得春。
 三韩空琐碎，万落自埃尘。
 使者风流在，诗人格调新。
 骊珠忽投我，神笔动惊人。
 平昔持州契，于今识路津。
 去天知不远，咫尺仰威神。

开篇以“低徊”“突兀”形容邻霄台峭拔孤高立于闽水之滨，登顶南望水势滔滔迎面而来，颇有欧阳修“登斯楼”之感。诗中“使者风流在，诗人格调新”，赞美两位好友的人品诗品，在忽然收到两友的佳作时，如“骊珠忽投我，神笔动惊人”，只因“平昔持州契”，忙于公务，“于今识路津”，两位的诗作燃起诗人的创作热情，如同找到熟悉的路口。“去天知不远”句，颇有李白“离天三尺三”之势，呼应了开篇的“突兀”。

当年乌石山是滨南城墙外湖泊滩涂的高起之地，直至清代官员李拔，仅立于乌石山半山处，即可居高临下“望耕”（乌山望耕亭），可见处山巅的邻霄台之“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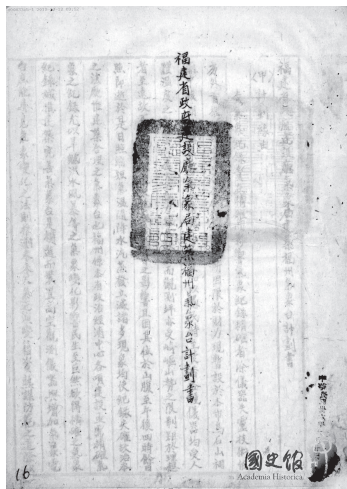
诗写于嘉祐六年，未曾提及“邻霄台”的祭天活动，蔡襄是否在知福州期间登台祭天，不得



蔡襄行草代表作《脚气帖》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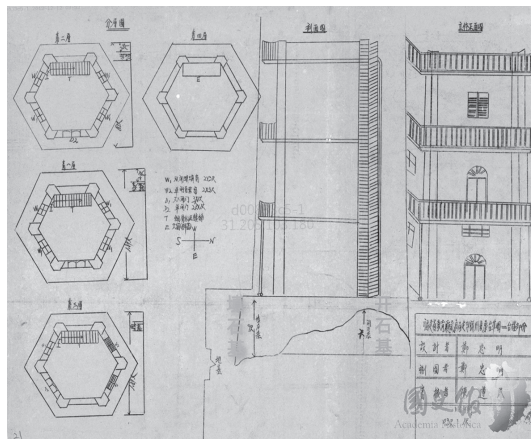
大门柱上的福州国家基准气候站方位及建站时间



建筑福州气象台计划书封面（薛纪天提供）



计划书(乙)条实施办法（薛纪天提供）



气象台草图—台楼部分（剖面图可见楼基于邻霄台顶的施工方案）（薛纪天提供）

而知。三十五年后的元祐六年，时任福州的父母官一定登台祭天过，这次活动有《大宋福州社坛铭》摩崖石刻为证。

时光荏苒，彻底改变“邻霄台”近千年的祭天功用是在1934年7月气象站建站以后。记录在福州国家基准气候站观测点大门柱上的方位及建站时间如今依然可见。

根据“国史馆”资料《福建省政府建设厅气象局建筑福州气象台计划书》中(乙)条实施办法记载，“在福州乌石山最高峰之邻霄台招商建筑一六角形之气象台，并在台之前方开一观测坪……”附上的建筑草图一楼台部分的剖面，清楚描绘了邻霄台顶作为楼基，需要开掉岩石顶部的石基和填补凹处石基的图示。

不过，这图原设计是在邻霄台上建一座三层六角小楼，而从20世纪50年代部分职工楼前合影等影像资料看，外观上仅有一层，为何改变不得而知。

新中国成立初期延续使用这民国时期的小观察站，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楼旁的岩壁上还留有“邻霄台”三个大字石刻。

欣闻市政府“还山于民”第二期启动，得知位于乌石山主高峰的省气象台搬迁，解除了军

管。朋友圈不时出现探访拆迁中气象台的图文。暮春时节有幸走近这国家气象观测站的大门。顺坡而上尽所目击，右侧远处保留下来的气象基站粉砖楼，在绿草茵茵、栅栏齐白的观察场尽头静候；近处一块重见了天日的石刻碑文，正由施工人员精心清理着……施工人员指点着那粉砖楼，对照着手中的图册说，那位置应是邻霄台旧址。

有媒体报道，找寻消失的邻霄台成为工程的重要内容。“邻霄台”作为乌石山的标志之一将重建在乌石山公园的制高点。期待登上重建的“邻霄台”，默诵蔡襄的诗句“去天知不远，咫尺仰威神”。



前方粉红楼原是邻霄台的位置（2021年4月）

大山里“吃素的”古厝

◇林 山

听说“大山食菜厝”是福清市第一个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这应该是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古厝啊，探秘之心油然而生。

这个神秘的传统村落，在福清东北部的南岭镇。到了这里才知道，这座“大山”不是森林广袤、岭峻雄伟的大山，而是一个行政村的名字。大山村依山而建，临水为界，辖有食菜厝、高厝楼、卢厝楼、下底楼、单斜铺5个自然村。“食菜厝”的名字很特别，福州民间把“吃素”称作“食菜”，这就是有故事的地方。

大山村北面有山脉连峰，山顶6500亩天然高山草甸连绵几个山头，山峦起伏，草原辽阔，有“小呼伦贝尔”美誉。兼具滨海、山地的地理环境赋予大山村优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浓郁的历史风貌、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风情民俗，构成了极具特色的食菜厝传统村落。

食菜厝民居建筑，是一座由13座古厝组成的寨堡式建筑群。正面十扇九间，面阔73米，深60米，建筑面积约4500平方米。其中十扇厝一座、八扇厝一座、六扇厝三座、四扇厝八座。以宽敞的庭院大埕为中心；各厝依山麓而建，形成了进深短、面阔宽的民居布局特色。建筑屋顶多为坡屋顶，墙面为石材质，以花岗岩石为建筑材料的民居构成了沿海民居住宅的独特风貌，是福清罕见、全省少见的寨堡式民居。

由于地处偏僻的福清南岭山野海隅，时有海盗、土匪侵扰，村民宅地的选择就要从防御角度多考虑，村落建筑组群布局分散，布于田地与

山体之间，不同于平原地区的传统集中紧凑型村落。而建筑风格也相应的体现低调、朴素、实用。

食菜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解放战争时期，闽中游击队有百多号人住在古厝里，开展武装斗争，为闽中地区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食菜厝按古城方式建造，四周围墙高约两丈，并建有东西两个防御城门。山里土匪多。陈传松在防盗防匪上对房子下足了功夫。用滑轮吊控大铁块下闸做寨门，防侵犯者火攻炮轰；在主厝与西侧的厢房之间挖了地下通道，以便进退；在屋脊沿墙铺设水道，解决被困时期的饮用和消防需要。同时，利用地形落差，在西厢房下建有地下室三间，可通往主厝。据专家考证，西厢房地下室在当时极可能具备安保或值勤的功能，相当于现代的保安室。

在食菜厝后，层层叠叠的梯田处，望去像一只乌龟的背部。相传一位尊者到大山社学讲授理学，突遇山洪爆发，村民把他背到此处。山洪过后，尊者打坐的地方成了龟背的样子。久而久之，大家把它叫做“龟山背”。这位讲理学的尊者是谁呢？有人说是宋代著名思想家杨时，人称龟山先生。他先后学于程颢、程颐，有“程门立雪”和“吾道南矣”典故。其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其一生精研理学，对朱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食菜厝石拱门额上嵌着“松风”二字

也有人说是朱熹。朱子当年来过这里，或许在村里讲过学。有资料记载，朱熹经过食菜厝附近的梨洞古驿道，去长乐潭头的二刘村找他的学生刘砥、刘砺兄弟，在龙峰山上筑室讲学。走到这里感到口渴，俯身掬起道边岩石下的清泉解渴，并留下“龙津”摩崖题刻，至今还在。

到“食菜厝”田野调查，其故事，传说版本不同，梳理了一下，大概是这样的：

创建食菜厝的是清嘉庆年间福清城头星桥人陈传松。他娶了隔壁乡南岭大山村卢厝楼的卢家女子，不久添了个孩子。他父亲陈加亭觉得儿子已娶亲生子，家中又贫穷，就让他自己谋生创业去。传松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出路。妻子卢氏建议，不如去投奔娘家吧。于是，传松携妻带子来到南岭大山村，住进卢家，以养鸭子为业。不久，传松跟岳父商量好，在附近的山丘搭了个鸭寮，独立生活。夫妻俩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日子在紧巴巴地过着。

一天，卢氏在灶前烧火时，灶脚突然塌陷，忙叫丈夫来处理。传松在清理时发现，灶下是个大坑，里面放有三个瓮缸，顶上是一米宽的厚石盘盖着。夫妻俩齐心协力翻开一看——天那，满

满三大缸白花花的银子！

激动得无可名状的夫妻俩，伤透了脑筋：怎么办？是谁埋的？海盗还是土匪？还是逃难躲灾的老财巨贾？……不知道他们熬过几个不眠之夜，也许，就只是守着银缸美美地睡了一觉，他们就拿定了主意。

过几天，传松说是去走亲戚，顺便去了石竹山祈梦。回来跟邻里说，听到一句话：“要想富，换肠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父亲因食蛭饼不幸被蛭壳卡在喉咙而去世，留下“食素不食荤”的遗训。于是，传松一家开始“换肠肚”，改吃素，也就是俗称的“食菜”。

自打选择吃素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家的鸭群生蛋开始“超生”。过去，100只鸭姆，一天最多下100个蛋。此后，则会下到近200个蛋。接着，养鸭卖鸭蛋攒了些钱，拆了鸭寮，盖了个小厝。

后来，陈传松说得仙翁托梦指引，从家里地下挖出了一些银子，所以就开始盖大厝，没想到，这一盖，就盖了18年。这其间，他又添了4个儿子，所以不断扩建。

斗转星移，大山村人突然发现，卢家那穷女

婿，已成为当地的大财主了。人们也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他家盖大厝不尚奢华，却在防盗防匪上下足了功夫。你看，寨门不大，兵荒马乱的土匪不好进来；用滑轮吊控大铁块下闸做寨门，防侵犯者火攻炮轰；在主厝与西侧的厢房之间挖了地下通道，以便进退；在屋脊沿墙铺设水道，解决被困时期的饮用和消防需要。

建了大宅厝，他自己想起个什么名？不知道。替他想想，叫卢陈厝？显然不行。叫陈厝？在娘家地盘上，也不妥。结果是历史接受了乡间的俗称，叫“食菜厝”，也就是说“吃素的那家”。接着，约定俗成，厝名又成了地名、村名。当地方言歌谣唱出食菜厝的历史：一头鼎，一头仔，逐一群鸭子，搭一间寮子，挖三缸银子，起一座厝仔……

传松的低调藏富谋略取得了成功。如果你到大山村，要拜访“国”字号传统村落食菜厝，没有人指点，是找不到它“猫”在哪里的，即使它依山而建。就是有人带路，在挂着标识牌的古厝门口，你还是没能感觉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食菜厝。

门确实觉得小了些，一面古朴的石墙，一个只容两个人并肩进出的一人多高的寨式石拱门。

只有看到门额上嵌的石匾，读着上面题的“松风”，才会相信，真的到了远近闻名的食菜厝。

西头寨门石匾题的是“竹雨”。有人说，这“松风”“竹雨”是朱熹到这里时题的。“松风煮茗，竹雨谈诗”，多么风雅的情调，是闽都士族追求的高雅生活啊。只有这里，才能感受到古厝主人的襟怀和格局。

古厝门面很朴素，中间的正门没有高大的台阶，也没有设门当户对。从大门往里看，三进宅院的明暗光线，形成纵深悠长并且层层递进、步步升高的建筑格局。步入宅院，没有看到什么石雕、砖雕和灰塑，也极少见到图案，更没有文字，除了今人贴的春联。而从屋后高处俯瞰，大厝平面呈工字形，主人把发现窖藏银子的地方，作为整个大厝建筑的中心，足见用心良苦。

屋顶东西两边，有沿脊水槽，把后山上的泉水引到厝前水池，如双龙戏珠。放开眼界，大厝依靠大山，面向宽阔，周边双溪如玉带环绕。食菜厝选址在龟山的颈部，人家说这里的风水真好。

好风凭借力。如今，为更好地保护传统村落，发挥文化旅游融合优势，促进地域经济发展，“大山食菜厝”华丽转身，正在把绿野仙踪的苍翠大山和活色生香的古村落来个“天仙配”，精心打造福清南岭的“大姆山·食菜厝景区”。



食菜厝外景

浸透书香的传承

◇江 榕

脱去冬的繁重，迎来春的轻盈。梁厝，在蓝天下金灿灿的油菜花丛中掩面而笑。村里的老树抖落冬的萧瑟，枝干苍健，还有粉墙黛瓦上，似在书写家风的传承。漫溯梁厝这条“时光隧道”，无论是正在前行的少年，或是青灯画案边上的人，皆诵读不辍，传承着梁厝精神。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朱熹著名诗句，永盛梁氏宗祠前的一池悠悠塘水，正述说着这里与他的情缘。宋隆兴元年，梁汝嘉（梁姓始祖）与朱熹结为挚友。二人共同登茶洋鼓岭时，在白云峰山顶看到此地状若展翅、掠江吻海的紫燕，朱熹感叹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并建议梁氏家族迁居于此。如今梁氏宗祠厅堂上悬挂的“貽燕堂”题匾，传为出自朱熹之手。当年这里还被作为讲学道场使用，名为“梅涧”。从宋朝至清朝，梁氏家族共走出了二十多位进士，坊间更有“无梁不开榜”之说。许多大家族都重视教育，梁氏更不例外。村民回忆说：“宗祠不仅是先人的讲学场所，更是他们儿时的学堂。”

行走梁厝，许多游客都会驻足在梁氏宗祠旁，宗祠大门两侧的一对白象，引人遐思。其实是当时每户人家捐出的陶瓷酒盏拼镶而成的。另有记载，说白象的眼睛曾是用夜明珠所做，后因躲避日寇的偷窃取下隐藏，年久日深便不知去向。祠堂中供奉梁鸣谦，清咸丰九年（1859）中进士，后因母亲年老多病，毅然辞去京官，回乡侍母。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在马尾致力船政事业，及沈葆楨从其手中接过船政重担后，就聘请梁鸣谦进福建船政衙署。梁鸣谦有着强烈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他看到船政的机械设备都是从外国购入，技术力量都要依靠洋人的被动局面，深感后患，于是向沈葆楨建议：办船政不能全靠洋人，需自力更生。当时买进的机械设备写的全是洋文，梁鸣谦亲自组织人员深入车间向洋匠学习请教。机械设备从拆解到重组的过程和内部构造，他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凭借深厚的外语功底，他翻译了很多重要资料，对船政局的技术引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得到了沈葆楨的大力赞赏。同治十三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沈葆楨临危受命带兵巡台，整顿海防，梁鸣谦随同，为其建言献策。日寇被驱逐后，梁鸣谦参与提出的“对台政制疏陈十二便”，为台湾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光绪元年（1875），梁鸣谦随沈

葆桢返闽，以抚台功加二品衔。梁鸣谦一生淡泊名利，喜欢以诗文寄情言志，他以高尚的人格影响着子孙后代。

梁氏家族走出了多位历史名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梁厝走出了2位中科院院士。其中一位就是梁鸣谦的曾孙——梁守槃，他是中国第一任导弹总设计师、中国海防导弹之父，中国航天科技工业领域的“四大老总”之一。1916年，梁守槃出生；2岁后随母亲到北京生活，与其舅父林旭同住；4岁就开始在家中私塾读书，学习小学的各科教材和“四书”等古籍，长辈们通过诗文故事教导他为人处事和治学的道理；11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学；后在战乱中多次被迫转学，但他利用停课的时间，潜心自学，为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积贫积弱倍受欺凌的旧中国，“科技救国”“工业救国”理想震撼人心，此亦在梁守槃心中慢慢生根发芽。后来，他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工程专业。1937年6月15日毕业，适值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梁守槃被分配到南昌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学习，了解到当时中国的主要机械装备都是从美国购进，美国还向中国提出抗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要“现款自运”，面对帝国列强的无情欺压，他深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理，中国要撑起自己的脊梁骨，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自主创新，摆脱他国控制的被动局面！1938年，在父亲梁敬鎔的支持下，梁守槃奔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他珍惜学习机会，夜以继日，发奋苦读。23岁时，他满怀人生抱负，回到风雨飘摇的中国，选择在大学执教，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批航空人才。

1956年，为了增强国防实力，提升国际地位，国家领导人决定要发展中国的国防航天工业。9月，梁守槃奉调入京，参

与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工作。面对苏联摇摆不定的态度，他态度坚定地说：“苏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固然好，可以缩短我们探索的历程，发展得快一些。如果苏联不援助，我们就应痛下决心，自己动手干，走自己的路。”

梁守槃的贡献与作为，值得大书一笔。仅再举一例，以见一斑。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突然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和技术支持，并留下一句话：“中国的液氧杂质太多，你们如果用中国的液氧来发射，不成功我们不负责任。”当众人一筹莫展时，梁守槃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经过反复计算和查找资料，他十分自信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中国的液氧不行，是有人把杂质的气态容积当做了液态容积，造成出现了1000倍的差距，中国的导弹可以用自己的燃料。”并立下了军令状：有问题就杀我的头。

事实证明梁守槃敢为人先，用生命做的保证是正确的。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在飞行了7分37秒之后，准确打中了554公里外的目标，这个记录比仿制的导弹还要远。

梁守槃以他渊博的理论知识、敏捷的思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一次次攻坚克难，将中国的航天梦照进现实，也将曾祖父的强国梦传承相续。他不计个人得失，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身国家事业。我想，这正是梁厝的精神。



梁氏宗祠

何遂与何振岱

◇何华龙



何振岱像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所以三坊七巷边上的那条路叫817路。福州刚刚解放第10天，当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张鼎丞乘吉普车到南后街文儒坊巷口，接着步行到大光里拜访何振岱。当时张鼎丞身旁有随从二人。由于何振岱不认识他们，竟然拒见。张鼎丞连说：“是您老的学生何遂让我来拜访恩师的。”何振岱知道原来人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张鼎丞，连忙口言：“首长礼贤下士，失礼了，失礼了。”张鼎丞的来意是请何振岱出任福建文史馆馆长，但何振岱说：“我今年已83岁了，力不从心，谢谢共产党关怀，望另请高明。”后来，何振岱当了福建文史馆名誉馆长，为文史馆阅稿润文，每月车马费300斤大米。何振岱一直任此荣誉职务到1952年12月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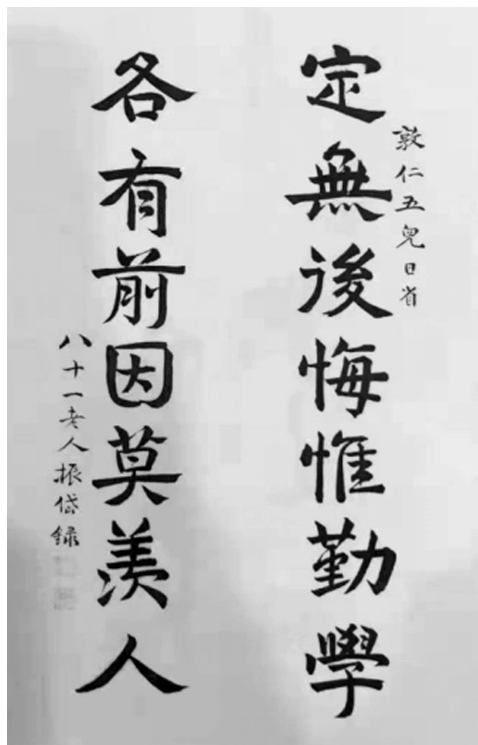
何振岱（1867-1952），字梅生，又字心与、觉庐，年60后改字梅叟。侯官县（今福建福州市区）人，祖籍福建省福清县（今福清市）南华乡。他虽然没有在福清出生，但对家乡非常热爱，自号南华老人，以示离土不离乡。他父亲是个秀才，曾任福清县府幕僚，但家道贫寒。何振岱幼时聪慧，极爱读书，但因为家庭贫困，父亲无法让其上学，竟要他到店馆做学徒。幼年何振岱求学心切，不从父命，加上其母重学，宁愿作女红，供子上学，于是他才最终力争到在私塾读书的资格。聪明的何振岱，十二三岁便能熟诵《五经》《史记》《汉书》，出口成章，下笔为文，千言立就，很得塾师赏识。后来，他在书房贴楹联：“定无后悔惟勤学，各有前因莫羡人”以自警。

辛亥革命后，何振岱与陈衍同回福州。民国4年（1915），受福建巡按使许世英聘请重修《西湖志》，任总纂，历时9个月成书，共24卷40万字。次年，参加陈衍的《福建通志》编纂工作，其中的《艺文》和《列传》多由何振岱执笔。民国11年，何振岱应邀赴京在何鸿年家任教读。民国25年，回福州，家居十余载，以诗文自遣。抗日战争中，福州两度沦陷，日军曾托人聘他为顾问，均被严词拒绝。何振岱与郑孝胥素有交情，特别倾心于郑孝胥的诗功；但自从郑孝胥参加伪满后，何振岱誓绝与之往来，并将来往书信和诗文全部烧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褒奖抗日期间坚贞不屈人士中，何振岱名列福州首位。何振岱的后人何云后来回忆：“与生活习惯相比，我最敬佩的是爷爷刚正不阿的气节，以及对生活、生命的敬畏之情。这才是支撑我们家族绵延不绝的精神财富。”“爷爷要求子孙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含糊，泾渭分明。”何云说道，“爷爷不仅对家人严格要求，对学生也秉承同样的‘家风’。”何振岱时常勉励学生先器识而后文艺，不仅要潜心学问，更重要的是先学做人。

何振岱一生皓首穷经，门下弟子也随其性，大多潜心钻研学问，才华横溢。他的弟子中除了闻名遐迩的“八才女”外，最为出名有两人：革命烈士、原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和辛亥革命元老、黄埔军校代校长何遂。何振岱与吴石的师生关系大家比较熟悉，现在，重点介绍何遂。何遂（1888-1968），字叙甫，祖籍福清市港头镇占阳村，生于福州鼓楼区灵响，16岁从军反清，19岁加入中国同盟会，系广西同盟会支部创建人之一。辛亥革命，何遂追随吴禄贞发动“燕晋联军”起义，在石家庄扣押清军辎重列车。孙中山曾说：“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之后，何遂参加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舍生忘死，铁血共和。何遂曾任国民军空军司令、第三军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北京政府航空署署长，陆军中将。他中年弃军从政，曾任黄埔军校“代校务”、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何遂与朱庆澜将军共组“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西安事变后，何遂与中共高层建立良好关系，对人民解放事业多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司法部部长，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

何遂祖籍地同江镜南华村相邻。迁居福州后，何振岱居住在三坊七巷，何遂居住在相邻的灵响路，两家直线距离不下500米。何振岱比何遂大21岁，什么时候当过他的老师目前没有明确的记载，我查阅了由何达主编的《何遂遗踪》，里面没有提及，也询问了何遂的后人何达宁先生，他也表示不是很清楚。于是我托好友、收藏家陈斌先生询问何振岱后人，希望找到蛛丝马迹。陈斌通过林则徐后人林祝光先生找到何振岱的曾孙女何欣晏，她的爷爷是何振岱第三子何敦敬，曾做过福建省银行秘书。为何要这么周折，因为何振岱的夫人郑岚屏是林则徐的外曾孙女，他们的后代也都有来往。远在美国的何欣晏收信后对此高度重视，亲自向她的父



福州三坊七巷何振岱故居旧貌

亲求证，得到确认。同时，我找到了闽江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刘建萍所撰的《何振岱评传》，书中第70页里写道：吴石由其挚友、何振岱的另一得意门生、闽籍将领何遂介绍与叶剑英、李克农会面，并在南京普陀路四号何遂公寓共宴畅谈。由此可知，何振岱与何遂的师生关系确凿无疑。

根据《何遂遗踪》及《何振岱评传》的年谱中的行踪，两人的交集最有可能是1893年，是年何遂6岁，受教于私塾，直到1898年，期间曾师从何振岱学习诗词创作，而且深得其真传。可能当时何遂很少向家人提及小时候的事，以至于何达先生编辑《何遂遗踪》时没有收录进去。1903年，何遂由蜀返闽，舟过瞿塘所作一首诗：“滩行最险处，涛声乱入耳；仰视不可攀，返顾莫能止。何安复何危，瞬息决生死；远游良多艰，壮心未能已。”其时他才15岁，可以看出在诗词方面就已颇有造诣。1926年，留德学医的日本籍名医矢原谦吉在北平开医馆，由于医术精湛，许多达官贵人及其亲眷求诊，因此得以接触众多军政界人士，留下许多不同于正史的秘闻，辑为《谦庐随笔》一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书中对张学良、冯玉祥、宋哲元等民国时期朝野名流颇多臧否，唯独对何遂称誉有加，说他“豪放有才又旷达，真文士也”。1927年3月，何遂与曾任浙江督军兼省长的吕公望泛游富春江，作《与吕公望谈旧作口占》：“死无所憾方为鬼，事若因人未是才；堪笑汗牛世上史，半从谀墓攫金来。”表达了自己为崇高理想奋斗不息，死而无憾的雄心壮志。1933年登高之作《无题》：“新亭涕泪终何补，往事难为挥麈谈；无那长空归雁急，劳人风雨又江南。”表达了自己抗日受挫，且受蒋介石限令，不能杀敌报国，处境陷于尴尬的苦闷心情。以上事例不一一枚举。1954年，何遂在太湖疗养时，曾将其旧体诗整理选编成《叙甫诗》。陈毅看了他的诗稿，盛赞作品富有爱国思想，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并诙谐而自谦地说，不过是“佛头着粪”而已，同时将自己的近作《莫干好》一词抄赠给他。何遂非常高兴，把陈毅的赠诗裱在自己诗集的卷首，当作序言。可惜，此卷毁于“文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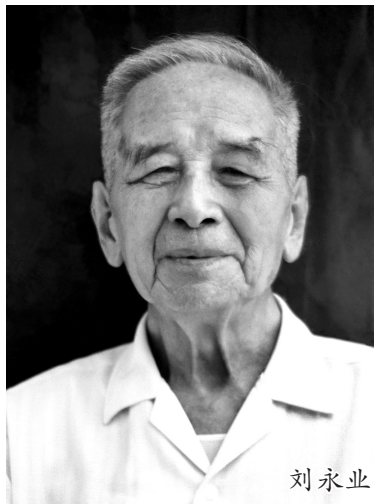
何振岱不但诗文极受称羨，还能琴善书通画，画作不论山水、花鸟，极见清凄之气，灵气蒸蒸，秀气泱泱；所作书法，则见清雄刚韧，底蕴劲丽，甚为世人所崇。恩师何振岱的崇高的民族气节深深影响了他，师徒二人所绘之梅花都具有傲骨，都体现了福清人的真性情，展示了福清人的民族正气、骨气、底气和勇气。



何振岱画的梅花



何遂画的梅花



刘永业

福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刘永业 与“电光刘”家族

◇石丽钦

福州电气公司创办人刘家，是闽中望族，世代为官，民国后弃官从商。以刘崇佑为首的5个兄弟联合8位名流，集资买下福州耀华电灯公司，创办的“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福州第一家民族工业，誉称“电光刘”。刘永业是刘崇伟的长子，曾任福州市副市长，第一届福州市政协副主席、民建福州市第一届委员会主委。

百年老宅建成电力博物馆

过去，福州有三座最高的建筑，一座是乌塔，一座是白塔，再一座就是刘家电厂的大烟囱。100多年过去了，“电光刘”的许多厂房都已消失，而在台江区新港路4号福州供电公司院内，尚存一座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砖红色洋楼。这是“电光刘”于1914年建的“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当时旁边还建有发电厂房和高耸的烟囱。2009年，经建筑性加固和保护性修缮后成为国内首个省级电力博物馆——福建电力博物馆，是难得的电力工业遗产。馆内有1435件藏品和1897张图片，展品包括1937年国民政府为表彰福州电气公司对社会的贡献而赠送的铜钟、1935年建成跨江输电线路的场景、上世纪50年代德国西门子生产的汽轮机、1988年的电秒表等

等，记载了从1910年至今的福建电力发展的百年历史。

“龙山刘”富甲福州

“电光刘”是福州龙山刘氏的一脉，龙山刘氏明末自河北进入福州，住在鼓楼区光禄坊，称“龙山刘氏”。刘彬为“龙山刘氏”的入闽始祖。刘彬子孙大多当官为宦，特别是十五世的刘齐衢和刘齐衡兄弟，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同榜双进士，其中刘齐衢官至光禄大夫；刘齐衡还是林则徐的长女婿、河南布政使，两兄弟一同享誉桑梓。刘齐衡为官20多年，省食俭用，剩下的俸禄全部都寄回家，除了在宫巷买了一幢8进的大宅和一座2进的旧院外，还在光禄坊买下4个相连门牌号的3进大宅子，称“刘家大院”。四座连排的大房子，占了光禄坊的半条街面，为现有福州最大的院宅，今为“社区博物馆中心展馆”。刘齐衡的后人刘崇伦（俗称电光五）、刘崇乐、刘栋业、刘永业等大多世居在这里。除了房子外，刘家名下的财产还有福州城内德成、即成、复成的三栋典当铺，洪塘科贡乡、福州北门、雷峰山、石仓园等处几百亩的田地。可谓“富甲福州”。



“电光刘”一家合照

刘齐衡有7个儿子，分别是学慰、学恂、学性、学煊、学恺、学愉、学忬，称“心”字辈。其中有5个儿子先后出洋留学，唯有老二刘学恂坚守在福州故家。清光绪三年（1877），刘齐衡病逝。刘学恂便以父亲留下的典当业为基础，开设了天泉钱庄，并在福州、闽清、长乐等地开设4家典当铺，从开办到清光绪十七年（1891），天泉钱庄获利达15000元左右，是原始资本的一倍半。不久，刘学恂还创办了一家糖厂。但由于技术不够精通，设备落后，亏本停业了。民国2年（1913）刘学恂病逝，他有8个儿子：刘崇佑、刘崇伟、刘崇杰、刘崇善、刘崇伦、刘崇侃、刘崇良、刘崇佺。这是“崇”字辈。崇善、崇良早夭，只剩下6人，除了刘崇佺当了飞行员外，其他5人先后留洋回国。

刘家精英创办大工业

福州电气有限公司的成立始自刘崇佑。刘崇佑是刘学恂的长子，字厚诚，号菰生，17岁时中举人，后东渡日本留学，明治法政学堂毕业，人称“双榜举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福建省咨议局副议长，宣统三年（1911）三月，与林长民联合创办福建法政专门学校，自任董事长，社会声望很高。1910年，他领头召开兄弟家族会议，确定成立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此，刘崇佑在福州找到一家叫“耀华”的电气公司。耀华公司是福州有识之士林友庆等人创办于



福州电气有限公司部分董事及技术管理骨干人员

宣统元年（1909），因为营业亏损、资金短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等原因，没有获得政府批准。刘崇佑同几个兄弟商量决定收购“耀华”。他们一方面委托福州警局总办陆子良出面，获得政府的批准；另一方面，由刘崇伟出面集资8000元，承接耀华电灯厂的财产，正式注册成立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台江建成新港发电所，安装了两台15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

俗话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经过不断的努力和组合，福州电气公司注册时，资产有12万元，兄弟5人和陈之麟、林长民等8家股东参股。之后，刘家投资4万元，占总股本的三分之一，控制了整个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这是刘崇佑最明智的选择。

宣统三年（1911）10月，电气公司开始顺利送电，福州城一片光明。据史料记载，当时的电灯用户为234户。至民国3年（1924），达到11743户。1913年4月至1914年3月，公司电费收入105948.31元，纯利润9977.81元；1917年纯利润达152787.21元，比增1431.3%。至公司第16届，电费收入增加至719369元，增长近6倍。公司进入鼎盛时期，但投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如在人力成本方面：公司成立的第一年，职工只有110人，至第七年，增至252人，到民国13年更是增至740人。公司创办了“艺术传习所”，广收艺徒，免费供应午餐，保障员工福利；在经济成本方面：第一年的法定股本为12万元，到1914

年，就增加至30万元，1927年增至100万元。

“电光五”刘崇伦，字雅扶，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电气技术，毕业回国后，曾参加工科进士试，是当年刘氏家族惟一学习电气工科的技术人才，任电气公司的常务理事兼技师长。他处处以日本三井垄断资本为榜样，筹划“电光刘”企业发展，成了“电光刘”最主要的负责人。“电光五”一接手家业，就在宣统三年（1911），在福州新港建立一个发电所，开始送电。民国9年在建阳筹办梨山煤矿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用部份生产的烟煤掺烧发电，开创福建省用无烟煤发电的先例。同时，他以电气公司为中心，全面发展修炼厂、冰厂、油厂、锯木厂、精米厂、炼糖厂。还创办公大贸易行、刘正记轮船公司、福州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大用电料行、同光电行、福清电灯分公司、连江琯头电灯分公司等等。民国17年，在“电光刘”内设农村电化部，刘崇伦自任部长，亲自到福州西郊的科贡村创办科贡石仓农场，使该地的双季稻获得增产。民国21年，又在台江排尾建立第二个发电所，于民国23年开始向长乐县莲柄港灌溉区送电。从排尾到莲柄港，全线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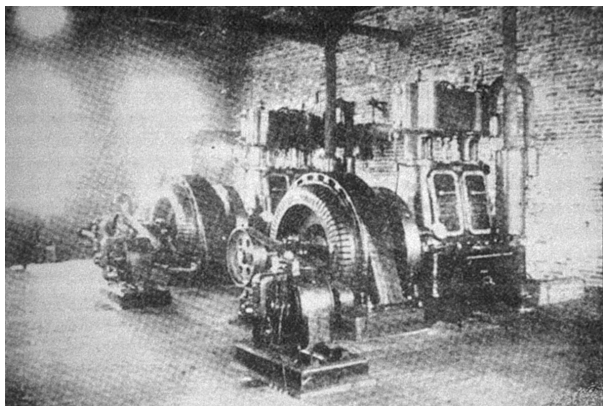
22.6公里，其中跨乌龙江长730米，跨江的铁塔高54.9米，为国内过江跨度最长的一条线路。总之，凡是涉足于民生，“电光五”和“电光五”时代的人都勇于担当，其中以创办刘正记轮船公司和创办福州电话公司的影响最大。

福州煤炭要依赖台湾运来，成本比较高，刘崇伦因此特别筹办了“刘正记”船行，拥有3艘千吨级货船。到了民国36年，“电光五”的福州电气有限公司还与台湾电力公司和资源委员会联合，称福州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安装5000千瓦机组，拥有职工480人，日供电数小时，分区轮流供电。当年的发电量714.47万千瓦/小时，供电量570万千瓦/小时，售电量304千瓦/小时，提高了福州地区电产品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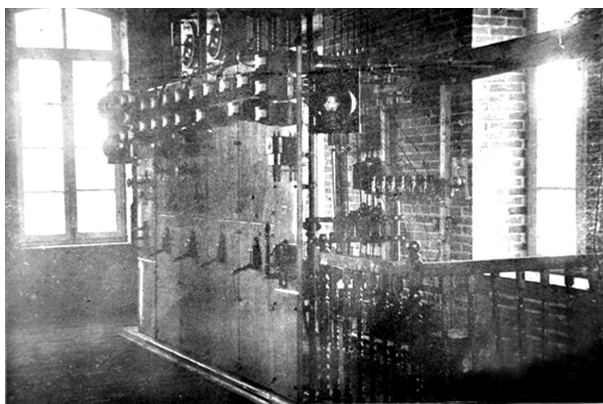
刘崇伦在电气公司走上轨道之后，1912年末又接手了官办电话，成立了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刘崇伦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将原设在学院前的交换机移至塔巷；下杭街三通桥的交换所移至中平路；桥南舍人庙的交换所移至麦园路，并将单线式磁石交换机改为复线式交换机，共三部，容量300门，实安装200多户。至民国16年，增至854户，增加资本14.2万元，可见其成绩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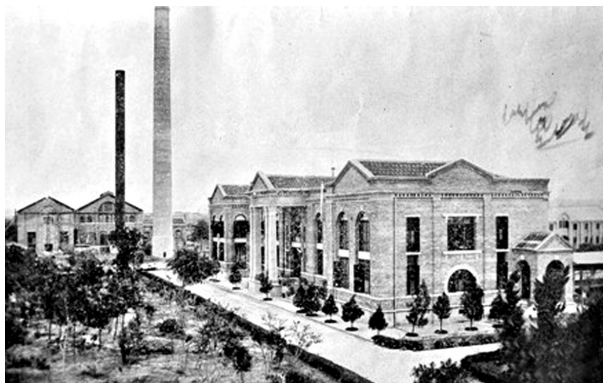
修葺一新的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原办公楼如今辟为福建电力博物馆。林钻摄



1911年，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新港发电所的发电机组。



1911年建成的福州新港电厂配电房。



1915年建成的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其中的发电厂烟囱被不少福州人认为是乌塔和白塔之后的“第三塔”。

煌。当时电话是奢侈品，但机关、学校、商店、公司、工厂等使用较为普遍。因此，电话业务也在逐年增长，电话从成立之初的200多架增加至800多架，月租费收入也从1万多元增长至6万元。

时局动荡 刘家集团渐衰

民国18年，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刘家经济实力也逐渐衰落。刘家企业的纯利降至10万元以下，第二年降到了6万元，仅占总收入的6.5%。此外，福州油厂等营业不振；建兴锯木厂于1927年停办；福清和连琯电灯公司，由于地方封建势力膨胀，阻力重重，于1929年相继停业。福州电气公司因为受累也宣布停办各厂。电话公司有所发展，但由于偷电和拖欠费造成的资金不足，很难开展业务。据当年公司的高级职工王能超回忆：1926年和1929年，两次特大风灾，全市的杆线损失严重，福州大桥上的部分杆线都被吹到江里去。1928年，福州政府整修马路，截弯改直，移杆数十根，耗费了一大笔工料费。为了度过难关，公司决定向上海美国自动电话公司购买史端乔自动电话交换机1500门、话机1100部，计美金77066.21元，分5期付款，至1932年付清，并利息在内，共美金87670.53元。但公司无力付清，只得延期至1937年，又增加了一大笔利息支出。面对困境，公司只好采取下列办法：一、向福州台湾银行商借法币5000元，每年还1000元，5年还清；二、向申请装电话的用户每户预收押金100元；三、请每个用户认购公司股票5股（每股法币250元）；月租费八折优待；四、在旧用户换装新话机时，催交积欠话费；五、每月扣职工工资10元，作为储蓄。

民国18年2月，老大刘崇佑又一次主持召开家庭会议，决定解散旧财团，成立新财团。新的财团由新成员平均出资，偿还旧账，将剩余财产进行分配。新公司除了继续运行电气和电话经营外，另确立三项业务方向：一是成立公大商行，专营进出口业务；二是承接电气公司的附属冰厂，改名为成记冰厂；三是改组刘正记轮船公

司。这个新财团主要由刘崇伦在运作。他在电气公司内创办电化部，作为推销电力的手段。随后他增装3300千瓦新发动机，以求降低发电成本；购买自动电话代替原来的磁石式手摇话机，提高电话公司利润；又向中国、中央、交通、农业等4家银行组成的银行团借款16万元，向长乐县供电；成立福电铁工厂对外承接业务。但计划多数以失败告终。1937年，刘崇伦和侄子刘爱其被绑架杀害，这给了刘家沉重的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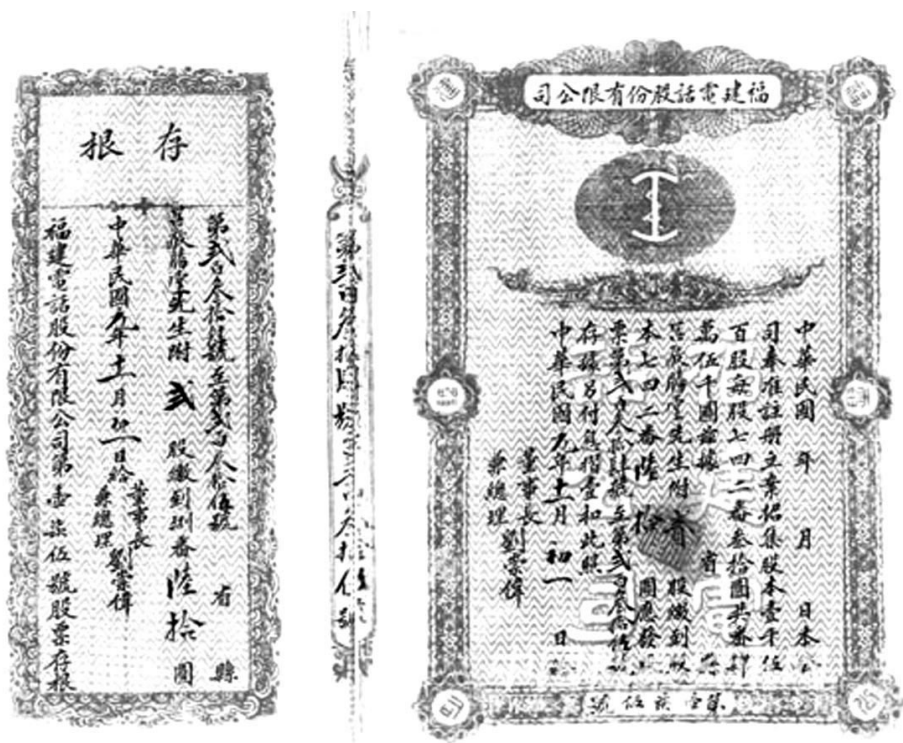
刘崇伦死后，刘崇伟的次子刘洪业正好由日本学习电气回来，临危受命，协助叔叔刘崇侃打理“电光刘”庞大的家业。民国28年，日本飞机8次轰炸福州。29年，十年不遇的大台风又袭击福州，造成了重大损失。到了1941年，企业第一次出现营业亏损。刘洪业只得向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提出“合并”的要求。合并之后更名为“福州电厂”，管理权移归资源委员会。这样，名义上刘家还可以作为一般的股东领取6厘的官息，但实际上分文未给。至于电厂所附属的冰厂、铁工厂等更是朝不保夕。到民国37年，刘家与黄浴沂合资创办的“众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也散伙了。民国38年，刘洪业与哥哥刘永业筹集100两黄金，租借原来的面粉厂，取名“众兴面粉厂”，继续经营面粉业。解放后，福州电厂、福州电话公司等都参加了公私合营。刘洪业担任福州电厂经理、福州市工业企业董事会董事长等职，1993年病逝。

勇开先河的刘永业

刘永业是刘崇伟的长子，出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民国22年（1933年）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管理系毕业，回到福州参与家族实业的创办与发展，先后在公泰、公大公司供职。民国25年，独资创办金融业“建纪行”，并任经理，兼福州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任等职。民国34年，先后任上海产业处理局副科长、青岛德孚洋行拜耳药房监理员、上海德侨房产处理局专员。1946年，合资创办众兴实业有限公司，任经理兼福州电力公司董事。接着与刘洪业合作，经营刘氏家族的企业。新中国成立后，刘永业关心国家

的建设和发展，带领广大工商业者，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掌管的福州电话公司成为福州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他先后任第一届市民建主委，市工商联第一、二、三届主委，福州市副市长，第一届福州市政协副主席。历任一至四届省政协常委，第一、二届省民建副主委，第一届省工商联主委，第五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八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彼时他年逾古稀，开拓创新志气不减。在省六届人大常委会期间，他积极推动福建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开了全国先河。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消费者委员会成立伊始，遇到消费者投诉却难以开展维权工作，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依，不能界定所投诉的问题是否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当时有个典型案例，1986年福州郊区樟岚村村民李庆发利用废弃的粪池和工业废盐腌制并销售大头菜，被媒体曝光后，中纪委和省主要领导都作了批示。这一事件后来虽然查清了，但如何处理，却于法无据。刘老深感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立法的重要性。他当时说：“只有有法可依，依法办事，才能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我既是消委会名誉会长，又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有责任推动消费者权益立法。”于是，他建议福建在改革开放中要率先为消费者权益立法，并牵头组织法规起草工作。在《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起草过程中，古稀之年的刘老自始至终亲力亲为。《条例》第六稿研究时，仍有人不同意，认为全国还没有消费者权益立法先例，连香港这样的购物天堂也还没订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刘老理直气壮地说：“现在改革开放，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全国没有消费者权益立法先例，福建可以先试先行。”面对重重阻力，怎么办？刘老当即派工作人员携带报告和《条例》草案去北京，直接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名誉会长王任重请示汇报。王任重非常重视这个地方性立法，当天就在《条例》草案上作了多处修改，并批示：“此《条例》很好，可供各地参考。”当时，这



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个《条例》草案拿到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审议时还是有较多的反对意见。怎么办？刘老又出了个点子，邀请《中国消费报》总编到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谈谈消费者权益立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终于让常委会组成人员统一了认识，1987年9月，《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正式通过！福建为消费者权益立法，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被誉为“一个全国性的创举”。刘老还有一个重大贡献是建议成立地方银行，得到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重视和支持，在省内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继广东发展银行之后兴业银行应运而生，为我省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促进和保障。1997年7月，刘老在省八届人大常委会届中逝世，享年89岁。

刘氏家族人才辈出

现在，刘氏家族后人有两万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及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除了“电光刘”的商业传奇之外，还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刘氏后人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电光刘”老大刘崇佑是著名律师。抗

战初期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因致力抗日救国身陷囹圄，刘崇佑作为律师团首席辩护人出庭辩护。民国31年，周恩来曾称赞他：“刘崇佑先生是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刘氏后人刘含章先生是位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曾在燕京大学等多所大学兼任教授，著有《物权法》和《继承法》等法律著作。当时郁达夫在燕京大学任兼职讲师，他到福州时，刘含章还曾关照他，让他住在刘家大院内。刘广楠先生更是为响应抗战，投笔从戎，参军抗日，新中国成立后，为航空业的恢复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奉献了终生。现在从商的“电光刘”后人还有：刘岳，刘永业长子，现任马丁传动件（福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瑜，刘洪业之女，现任福州鑫龙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喻龙，刘瑜次子，任福建盈峰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许多刘氏后代回到福州，看到文儒坊的刘家大院、电气公司大楼得以保留，备感欣慰，这也是刘氏家族在福州历史变化中产生过影响的重要见证。